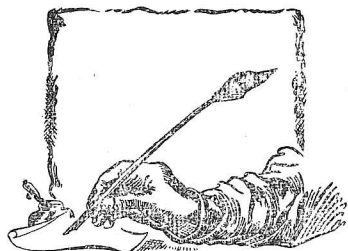


我
在
金
華

阮毅成



(壹)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到民國二十七年元月，我三十三歲，在金華。

我當時的職務，是浙江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

我自民國二十年元月，從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回國，即立志要擔任大學的教授，而且地點要在首都南京。內子也一直認為我最適宜的工作是教書，最不適宜的是從政。當時浙江高等法院院長鄭烈孫（文禮）兄想派我任建德縣的地方法院院長，我表示不就。他以為我嫌建德地方太小，又距杭州稍遠，乃擬改派我任紹興地方法法院院長，我仍予辭謝。其時浙江省雖則有七十六縣一市，但設有地方法院的縣份很少。大多數的縣份，還是由縣長兼理司法。高等法院只派一名承審員，為之助理。也就是說，在全省之中，只有幾個地方法院院長的職位。烈孫兄如此的厚意，在他人是求之不得，而在我却棄之如遺。我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繼續我的學術研究，並能從事寫作。而首都更是人才薈萃，可以就教於全國的俊彥。

幸而天從人願，我首先獲得了法官訓練所的聘書，要我講課。所址在朱狀元巷，屬於城南。繼又獲得了國立中央大學的聘書，要我在法學院講課。校址在大石橋成賢街，屬於城北。自此以迄民國二十六年，我一直在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及其附屬的地政與合作兩學院，及金陵大學，擔任教授。

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才均向國民政府集中。共赴國難的呼聲，使人人均思起而自効。政府也多方延攬，量才器使。於是我的新知舊雨中從政的人漸漸多了，也常有人來約我擔任政府的工作。我還是一本初衷，予以辭謝。而我當時的教書，研究與寫作的興趣極高，且自己覺得頗有收穫。

民國二十一年，江蘇省政府設置江寧自治實驗縣，以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系主任梅思平（祖芳）任縣長。其後又兼任江蘇省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梅的系主任，由胡次威（長清）接充。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浙江省政府設置蘭谿實驗縣，較之江寧則少了「自治」二字，約胡次威（長清）任縣長，胡因為是四川人，並不是浙江人，地方情形不熟悉，表示推辭。就有人說要我去，我仍以只想教書不思從政辭。次威去浙後，又兼任浙江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專員公署即設在縣政府內。而由我接替次威，任法律系主任。

據說浙江省的實驗縣，本來想就比較富庶的

浙西各縣之中選定一縣，而省政府的許多紹興師爺，却咬文嚼字的一再簽擬，選了蘭谿縣。在他們以為蘭谿縣離杭州較遠，不容易有人去參觀。縣長與幹部儘管努力，難以有表現的機會。

不久，聽說安徽省政府也要設置實驗縣，學校同仁常對我說：「以往都是法律系主任出任縣長，這一次一定要輪到你了，你是無法可以再辭了」。這當然是推測之辭，而我既不願回浙江，怎會願意到安徽去？安徽省政府的計劃，後來並沒有實現，也就不再有人向我提起。但我曾先後到江寧縣與蘭谿縣，去參觀過實驗的成績。

正式再向我提到從政的事，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中央明令改組湖北及浙江兩省的省政府。中央以原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揚卿（永泰）被刺身死，調浙江省政府主席黃季寬（紹竑）接替其遺缺，而以朱驥先（家驊）先生繼主浙江。胡次威與其時任浙江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的賀培心（揚靈），皆到了南京，住在太平路安樂酒店。有一天，我去訪視他們，適劉百閱兄亦在座。賀培心（揚靈）說：「這一次黃到湖北去，將約我任秘書長，並約現任浙江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王逸龍（先強）任民政廳廳長。我原任的浙三區專員，駐紹興，地位重要，最好你們兩位之中有一位去接替。」我說：「我早說過無意擔任實際行政工作，百閱兄是專講行政學及行政法的，自

以他去爲宜。」

十二月一日，上海市舉行普通考試，我奉國民政府派爲典試委員。我先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次晚，我在新亞又遇到了胡次威（長清）及賀培心（揚靈）。原來是黃季寬（紹斌）已從杭州到了上海，準備乘長江輪船到武昌去接事，他們是到上海來送行的。次威並且對我說，浙江省各區的專員，除第五區的魯長葆（忠修）未來外，都已到了上海。我說：「你們送行送出了省境，似乎太遠了一點。而且你們都在上海，各地的行政是否會停頓？」培心聽了大笑說：「老兄一直把自己關在學校中，太不知道政界的情形了。」

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上海市普通考試的第一試完畢，晚間我可以稍閒。十時，約次威到我房中清談，兩人對膝而坐，一直談到午夜三時半。次威是四川人，本善於講話，他告訴我許多從政的見聞，我真是好好的上了一課。次威說：「培心的湖北省政府秘書長及王先強的民政廳廳長都不能實現，他們二人只有還是暫留在浙江。」他又說：「對於行政工作已經感到厭倦，一俟實驗縣的名義可以結束，也仍舊回到南京教書。」後來，次威却歷任湖南與四川兩省的民政廳廳長，內政部常務次長與政務次長，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陷匪爲止，並沒有能再得教書的機會。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江蘇省政府因梅思平堅決請辭專員兼江寧實驗縣縣長，乃報請行政院調次威繼任。我在中央政治學校的教員休息室中聽到這個消息，正喜次威回到南京，可以多一個談

話的朋友，絕沒有想到他的調動，會牽連到我。不數日，朱驥先先生來信約我回浙江，接次威所遺的浙江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的缺，又來電報說：「蘭谿取消實驗縣名義，專員不必再兼縣長。蘭谿地點不適中，專員公署遷至金華。」我立即去函復謝，並申述「我迄無擔任實際行政工作的意思。而且在南京六年，一向都在教書，毫無行政經驗，決難勝任。」而朱先生又來電報，謂：「中日之戰必不可免，約兄回浙，爲桑梓共赴國難。一官半職對兄原不足輕重，務希勿再言辭。」朱先生又囑其高等顧問許緘夫（炳望）先生來信敦勸，許是我父親生前的好友，可以說是看見我自幼長大的。三月十日我收到他的第一信，我仍復謝。十七日，又收到他的第二信，說：「願先先生對兄素所欽佩，幸勿再以風塵俗吏爲嫌，而留戀於清高學府也。」

三月十八日，我因事自南京乘京滬路下午五時半車赴蘇州，住中央飯店。次日下午二時半，我自蘇州乘車回南京。車過鎮江車站，買了一份當地的晚報，載有當天上午江蘇省政府會議，決議梅思平辭職照准，派胡次威繼任的新聞。我想，胡次定係胡次威之誤。回到家中，沒有朱先生或是許先生繼續再來的函電，我想，大概可以倖免了。

二十三日上午，行政院秘書長翁詠寬（文瀨）忽然打電話來謂：「行政院今日舉行院會，已將兄之任命案列入議程。」下午，接到浙江省政府的電報，說是上午的省府例會，也已通過了我的任命案。因這一天正是星期二，適爲行政院

會與浙江省政府委員會的例會之期，因而南京與杭州，行政院與浙省府，同時通過了我的任命案。

事已至此，自知無法可以再辭，只得結束南京的教課，準備回浙江去。因爲正在學期當中，覓人代課頗不容易。幸而張企泰兄在京，他的鐘點不多，乃請他代授到暑假爲止。大悲巷六號如園的住宅房屋，交還給房東王時。書籍、行李及自備傢俱，運回杭州。自裝的二二四九五號電話，則送給程程秋（其保）兄。他甫交卸了湖北省教育廳廳長的職務，由我向中央政治學校推薦，到校任教。其時在南京要裝電話，頗不容易，程秋兄伉儷頗爲高興。抗戰勝利之後，民國三十六年八月，我應教育部部長朱驥先先生之聘，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遠東區基本教育會議中國代表團的顧問，於九月八日到南京出席會議，開會地點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程秋兄也是會議的出席人員，這是我們在長期抗戰之後第一次又在南京晤面，却同時發覺會場的電話，就是我們兩家先後用過的二二四九五號，不禁皆認爲是巧事。至於這個號碼經過了南京的八年陷敵與兩年的勝利還都，何以會裝在這一次會議的會場中，就無從得知了。

我的任命發表之後，在浙江省的朋友們，紛紛來函電歡迎。尤其是金華的父老，表示得更爲熱誠。金華是浙江省十一個舊府屬之一，原轄金華、蘭谿、永康、東陽、義烏、浦江、湯溪、武義八縣。但在劃設行政督察區的時候，浙江全省只劃爲九區，因而，第四行政督察區所轄的縣份，除原屬金華府者外，尚有原屬嚴州府的建德、

桐廬、分水三縣，共為十一縣。這些縣份都是浙江省的腹地，不與任何鄰省相鄰接。

何栢松（炳松）先生原籍金華縣，他首先從上海打電報給我，說：「鄉人聞大駕惠臨，皆表歡迎，郁老尤為欣喜。敬電速駕。」何先生所說的郁老，係朱郁堂（獻文）先生，是我國司法界的前輩，向以清廉鯁直著名。他的原籍，是義烏縣。而舊金華府屬各縣的旅京同鄉，也在三月二十七與二十八日兩日的午刻，在大西洋飯館，約我午飯。這兩天的主人，有原籍金華縣的徐壽城（東藩），永康縣的樓佩蘭（桐孫），義烏縣的方樂胥（文政）與金祖懋，武義縣的林子桐（文琴），浦江縣的于伯度（能模），湯溪縣的張惠康（佐辰），蘭谿縣的徐柏園等。他們本來都是我極熟的朋友，在南京常常見面。他們一方面為我回浙江去為他們的家鄉服務而高興，一方面也為了我離開南京此後不能朝夕過從而悵悵。他們都說：「金華各縣民風淳厚，我去了必可獲得地方的合作與民衆的支持，政通人和，可以有所建樹。」

次威到了南京，於三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在大三元餐廳，為我餞行。他以舊令尹之政告知新令尹，談了不少。他也說了許多困擾之點，大部份是在於與省政府的關係，小部份是關於專員公署與各縣的人事問題。他說：「朱主席與兄本來相熟，這一次又是他一再相邀，所以兄一定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但是日後兄不可能遇事皆去找主席解決，故對於各廳處的科秘人員，仍必須經常保持聯繫，否則便會遭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阻礙。而保安處與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這兩個單位，

係屬軍事系統，主席雖在名義上兼省保安司令，事實上是管不了他們的事。」

梅思平則如釋重負，却寫了一首詩，為我送行：

學士知州亦謫居，衣冠敲角本侏儒。樊籠初脫我方罷，符命新頒君上途。每嘆嫁衣縫不盡，祗緣貧女出無車。書生最怕功名累，好把無為作有為。

寫詩為我送行的，還有黃右昌先生。黃、湖南人，時任立法院立法委員，也兼任各大學的教課。我們常在考試院，一同命題閱卷。他本要為我餞行，我知道他喜歡寫詩，遂請他以詩代筵。他寫的是：

見說蘭谿景物幽，當年問俗我會遊。知君治理瞭如掌，到眼春光秀滿樓。現宰官身仁且美，是書生氣學而優（五六兩句，非阮公不足以當之）。承宣努力宏原濟，佇聽民謳載道周。

詩為先岳父錢逸塵（倬）公所見，遂依其原韻，代我寫一詩謝之：

學海何人探險幽，惟公健魄與天游。金科玉律能垂範，軌里連鄉賴服膺。邑有崔符羞作宰，才慙樛櫟豈云優。婺江東去承明晦，努力宣勤企馬周。

四月初，我夫婦率大元兒回到了杭州，住在英士街老家。我首先去拜訪朱主席，他仍一再的以共赴國難為言。他又說：「金華府屬，文風甚盛，代有名才。非有學識者，不能使地方人士折服。又非有膽識者，不能支持日後之危局。今水

陸交通均以金華為中心，蘭谿反而偏於一隅，故專署必須遷址，此後方可為軍政中心所在。」

他又說：「蘭谿縣政已實驗了多年，可以結束實驗了，但每年仍界以五萬元的預算，較其他各縣為多。專員公署既將遷移至金華，專員自不能再兼任縣長。為了兄以後做事方便，可由兄保薦一人任蘭谿縣長。」

我在南京臨行之前，也曾有人向我推薦過蘭谿縣長的人選。我以自己的文才，頗想約一位軍人擔任，以便在戰爭發生後，能得其助力，於是我想請陳佑華兄到蘭谿去。陳，浙江省宣平縣人，比我年長十多歲。他於滿清末年在浙江陸軍小學畢業後，又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速成科畢業。辛亥光復的時候，曾參加浙江省的學生軍到漢陽去作戰。他當時是在中央政治學校擔任總務副主任，我是因在學校擔任教課才認識他的。他雖則與我是浙省同鄉，以往却並未見過面。我看他平時處世為人，均極持重，且有行政才具，並嫻於公牘，乃托吳抱峯（維權）先生間接的探詢他的口氣，可否應我之約？吳，浙江省杭州市人，也是浙江陸軍小學出身，其時在中央政校任總務主任，佑華兄正是他的得力助手。吳先生後來答復我說：「佑華本無意於行政工作，但如兄約其回浙，因知兄平素待人寬厚，意極誠懇，可以考慮。惟佑華亦已離開浙省多年，且與朱主席無一面之緣。萬一不成，反而不美，仍希兄視情形再定。」

朱主席此時既要我保人，我便提出陳佑華，並簡單地說明他的學歷與經歷。朱就給我一張紙

，要我寫了佑華的名字，他就在上面寫了派爲蘭谿縣縣長幾個字，交給省政府秘書長樓光來，命其提報下次省府會議通過後，正式發表。樓原在中央大學任教，曾與我同事。而朱先生此時又係自兼民政廳廳長，辦事至爲方便。我說：「待我通知陳某到杭州來晉見後再發表不遲。」朱先生說：「兄能回浙，共支危局，我已甚爲高興。我對兄完全信任，全力支持。兄既認爲陳某可勝百里之任，不必先來見面，憑兄一言爲定可也。」

我乃即通知佑華來杭，並於他的任命發表後陪他去見朱主席。而後決定我們二人於四月十四日一同赴蘭谿，十六日同時接事。至於專員公署，區保安司令部與蘭谿縣政府的人事，高級的由吳挹峯與方青儒兩兄，就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在浙工作同學中，代爲遴選，作適當的調整與安排。中下級的則盡量留用原有人員，多屬當地籍者。當時從杭州到蘭谿，要先趁杭州鐵路火車到金華，再由金華乘蘭谿支線火車前往。其時錢江大橋尚在建築中，從杭州過江要趁義渡小輪。而杭江鐵路火車只有逢站必停的一種，並無特快、快車、慢車之分。我們一早從杭州過江乘火車，於上午九時開行。下午四時零八分到金華，換車赴蘭谿，五時四十五分到達，住在縣政府內。我們的前任專員兼縣長胡次威已先期去了江寧接事，留下他的秘書李耀西代辦移交。手續完備，賬册清楚，接收十分省事。我們於就職後，聯名在蘭谿及金華的報紙上，登載啓事：

毅成佑華，奉徵借來，藉作持衡之商榷；下車伊始，遽邀傾蓋之光榮。或折柬於婺州，

或驅車於蘭邑。重承優禮，益懷冰淵。招待多疏，尤深歉疚。祇以簿書執掌，暫難遍答高軒。聊憑楮墨通詞，容再親承緒論。先此佈謝，敬祈鑒諒。謹啓。

在我尚未到蘭谿接事之前，原在蘭谿追隨胡次威兄工作的若干位中央政治學校的畢業同學，對於朱主席取消實驗縣的名義，頗有後言。他們認爲江寧並未取消實驗縣的名稱，而蘭谿竟取消了，也就是降爲與一般的縣相等，失去了優越地位，是爲省政府不重視蘭谿及大家數年來努力的结果。他們並認爲我未向朱主席力爭，也有些失職。我乃於接事後的第四天，召集四區專署及區保安司令部與蘭谿縣政府全體工作人員，舉行聯合紀念週，親自說明省政府取消實驗縣的原意，是因爲實驗的結果，或已由中央採納，或已由各省各縣做做，不必再保留此名義。我並且表示我自己平時做事，向不願意佔着優越的地位，而要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與同等的機會上競爭，以求表現。何況省政府議決取消實驗二字，是與我的任命案同時通過的。其時我尚在南京，我又怎能事先向省政府抗爭？而且朱主席一再表示中日之戰就在目前，大家只有同心一德，團結禦侮，任何名利均不足爭取。蘭谿縣每年仍有五萬元的預算，爲全省各縣中之最多者，只要大家肯努力，不愁沒有事可做，又何必斤斤於實驗二字的有無？於是大家的心情方才平靜下來，工作乃得繼續展開。

我到職後更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要將專員公署遷到金華去。在胡次威兄的時期，他是以蘭谿

縣縣長兼任第四區專員。因爲縣政府是原來就有的，而專員公署是後來增設的。並且他是任縣長在前，兼專員在後，所以專員公署設在縣政府內。有些人員，是署府共用的。有些開支，是署府共同負擔的。我既不兼縣長，而專署又要另遷，則人員與經費必須分開。經我面報朱主席後，立刻均獲得解決。

我接事的第三天，就到金華去察看署址。我去蘭谿之日，曾在金華車站換車，但並未入城。這次纔是我真正的第一次到金華。也纔知道全城人口只一萬零，城街道寬濶，與杭州一樣的係石板路。城內只有一點小丘陵，地形大致可以說是平坦。金華地方人士聽說專署將要遷來，均表歡迎。因爲昔年的府治，本在金華，而蘭谿乃係屬縣。當時爲了遷就胡次威兄的實驗縣縣長，將專署設在蘭谿，他們本不滿意。於是紛紛向我提供專署的辦公地點，皆不外乎祠堂廟宇。經我一察看後，認爲舊天寧寺最爲相宜。但天寧寺雖初建於宋代，後經元至正年間重修，却早已沒有了佛像，也沒有和尚，並且也沒有大門。其時住在裡面的，是浙江省的保安團隊，且以大殿爲馬廄。寺旁是中山公園，略有花草，並有一圓形水池。園中設有一所民衆教育館，直轄於省教育廳。我當晚回到蘭谿，即擬具了遷署辦法，呈報省政府。請准以天寧寺及中山公園爲署址，但公園原另有大門，仍開放給民衆遊覽。一面寫信給保安處處長宣鐵吾兄，請他將天寧寺中的住兵移走。又寫信給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兄，請他將民衆教育館遷出。他們兩位皆復信照辦，惟民衆館需遷

移費五十元，由我報請省政府照付，民教館乃遷至金華的蘭谿門外前街新安會館。朱主席也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請求，並照數撥給了修理房屋與遷移的經費。我與專署及區保安司令部同人乃於四月二十七日，自蘭谿遷到金華，次日起辦公。天寧寺原面對城牆，幸而在修築自車站到金華江邊的公路的時候，已將寺前的城牆拆除，因而站在寺門口，就可以看到李清照筆下的雙溪。李在宋室南渡後，住在金華，曾有武陵春詞：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
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
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所謂雙溪，實係是武義江與金華江的合流處。晚衙初散，我常站在專員公署門前的台階上，面對雙溪。只見遠山近水，林密竹茂。江中停有大小舟船，却並無詞人在歌詠也。

天寧寺的大殿，高大寬廣，建制崇闕，能容五百人站立，而殿中竟全無木柱。以全部係木造房屋言，其設計構造，自屬不易。並可見其所有支持力量，均在於屋樑。正樑均係整根大木，並漆有元至正某年重修字樣。到民國二十六年我用之為專署大禮堂的時候，蓋已歷六百年。而在縱橫屋樑交接之處，均嵌有木製之笏頭，形如飛鳥，全殿共得百數，故邑人稱之為百鳥朝鳳。

我在修理天寧寺房屋的時候，也將中山公園予以整修，並補種了許多花木。每逢春季，玉蘭花盛開。月影之下，益顯其潔白可愛。夏秋則多醉芙蓉，朝夕顏色不同，一如花亦能中酒者然。

又園中原有兩株柏樹，傳係宋人所植，有屋三楹，名曰雙柏軒。我亦予修葺，以為游人休沐之所。並請邑人能詩文者，如徐壽城（東藩）先生等，題製聯額，以供吟咏。

我在蘭谿的時候，因妻兒均留在杭州，就獨住在縣政府內。到了金華之後，初住在車站附近新建的中國旅行社。因房金較貴，即移住在城內新開的浙東旅館，一面找合適的房屋，以為住宅。最初有人介紹在專署門前的左首，有劉姓的房屋，可以分租一部份。面臨大道，交通方便。事為王質園先生所聞，他就來看我，勸我不宜住到劉家去。他說：劉家的名聲不好，我如住到他家，可能會對外招搖。王君與我只係第二次見面，他寧可開罪其同鄉老友劉家，而對我十分關切，深使我感動。我乃改賃柴場巷十四號項斯家中的樓下房屋，為在金華的住宅。項女士也係金華本地人，任成美女中的校長多年，為一虔誠的基督徒，終身未嫁。她的房屋是當時的三樓三底所謂洋房，她與領養的一位女孩，名叫項美珠，住樓上，而以樓下租給我。她本無出租之意，也不願多與官方人士來往，因為聽說我原為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中人，才歡迎我去住。柴場巷就在專署的右邊，我乃在中山公園右面的土牆上，開一小門，與項宅相對，進出就更方便了。內子於六月間曾一度到過金華，旋仍回杭州，原以有孕宜在杭州待產。現因抗戰開始，乃於八月初率大兒大元從杭州乘民船，沿江上行，八月十四日才到了蘭谿，換乘火車到金華，住入柴場巷，而前一日八一三，淞滬已經發生抗日戰事了。

(貳)

辛亥光復，各省初設都督，並置民政等司，皆隸於都督之下，可謂係屬軍政時期的辦法。袁世凱當政之後，於各省設督軍及巡按使，分掌軍民兩政。袁死後，督軍改稱督辦，巡按使改稱省長。但在軍閥統治時期，名義上是軍民分治，事實上係以軍統治。凡任巡按使或省長者，皆須聽命於督軍或督辦。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抵定江南，於各省設省政府，並設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軍事各廳。這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由省政府統率軍民兩政。當時浙江省的地方武力，稱為省防軍。不久，軍民又行分治，各省軍事廳撤銷，另設保安司令部，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保安司令。並置保安處，為省保安司令的幕僚單位，獨立於省政府之外。省政府主席政務繁忙，雖兼了省保安司令之名，一切則概由保安處處長代為處理。省的地方武力，改稱為保安團，浙江省當時共有五個團。

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嚴令鄂豫皖湘贛浙閩七省，成立民團及保甲組織，此為國民政府恢復我國固有的保甲制度之始。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國軍在江西對共匪實施第四次圍剿。是月二十一日，江西省普設各區行政長官，其後改為督察專員，此為國民政府採用行政專員制度之始。

因為省級係省政府與省保安司令部平行，而主席與司令由同一人兼任。故區級亦由行政督察專員（簡任三級或四級）兼任區保安司令（同少

將)。但專員係直屬省政府的，區司令則係直屬於省保安司令部的，署部雖同在一處，但大門口則左右分懸兩塊銜牌。在法令的系統上，亦是各自為政。專員公署的編制，係設秘書一人，科長二人，視察二人，皆薦任職。下有科員，為委任職。所有人員，均由專員自行遴選合格人員任用，報請省政府銓敘。另有辦事員及書記，則屬雇用。至於區保安司令部，係設副司令一人，我初到第四區的時候，係吳中翰，後易為賀鏡芳，再易為馮國激。皆態度溫文，對我頗為合作。下設參謀一人，副官二人，軍法官一人，皆係校級。以下有尉官數人。自副司令以至尉官，均由省保安司令部直接任免，專員兼司令事先得預聞。另有直屬的特務隊一隊，計官兵共五十四名，係向所屬各縣抽調，餉項亦由各縣分擔。

我國在滿清時期，各省本有府治，浙江省就有十一個府。民國成立，廢府設道，浙江省設有四個道。道的管轄範圍，比府大得多，平均是三個府合為一個道。國民政府成立，將道廢除，各縣乃皆直屬於省。浙江省於民國二十三年，始設行政督察專員，將全省分為九區，大致照滿清時期的舊府屬劃分。因其係具有臨時性，更具有試驗性，究竟專員公署上對省政府，下對各縣縣政府的關係如何，並沒有成規可循，也無法只從組織條例中去探求。換言之，要看省政府主席，民政廳廳長，及擔任專員的人各人作風，以及他們之間的人事關係，各有不同。當時在浙江省的九個行政督察專員之中，向以第一區的王逸龍（先強），第三區的賀培心（揚靈），與第四區的胡

次威（長清），最著能名。王，安徽人，曾在內政部任民政司司長，對於法令不但熟悉，而且肯研究。第一區轄舊杭嘉湖各縣，那是一向稱為浙西的地帶，為全省文化最高，財力最富的地區。賀，江西人，有能力，善權術，講話具有煽動力。第三區轄舊紹屬各縣，也是人才較多財力較厚的地區。胡，四川人，因係以大學教授而出任蘭谿實驗縣縣長，再兼專員，加以他做事有條理，又擅口才，能文章，故易為各方面所器重。王賀二人，均係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季寬（紹竑）所延用，與黃的關係密切，可以說是言聽計從。

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者是。至於禹陵與蘭亭，因時間不及，準備下次再去。維知竟一日蹉跎，就一直未能去成，只有等到光復大陸以後，才能往遊了。不久，賀因黃季寬約他到湖北去任宜昌區專員，向朱主席辭職，朱派沈士華兄到紹興繼任。

因而在浙江的政界中，自易受人重視。我在奉命之後，到蘭谿接事之前，特先到嘉興與紹興去拜訪他們二人。因為我與他們本來是相熟的朋友，而他們的作法，也值得我參考。我看了他們的施政之後，就發覺他們是「虛官實做」。因為過去的府道，與當時的專員，本來皆是虛級。其最重要的職責，只是「察吏安民」。但他們二人因與前任黃主席關係深厚，所以可以上面代省政府做事，甚至不必請示，做了再報。下面又將各縣縣政府的事，取來做了，各縣也樂得有人代辦。我在嘉興，只停了一天，與王逸龍談了不少，也看了不少。他所說的，多尚在法令以內。他有許多修改現行法令的意見，皆為他的從政心得。我在紹興則住了兩天，賀培心講得比王更多，他善於分析，對當時浙江省黨政高級人員的派系，個性，作風，乃至於其交遊，嗜好，與日常生活，皆分析詳盡。他又陪我遊了紹興的東湖與柯橋，這在我說，都是第一次到。紹興本以風景著稱，

我將專員公署移到金華之後，便於六月四日

到衢州，代表省政府，參加第五區社訓幹訓班開學典禮，並拜訪閩浙贛皖四省邊區主任劉恢先（建緒），劉以盛宴款待。他的司令部中。一切陳設，均屬上乘，且有自製西餐的廚房，這在當時內地是極少有的。第五區專員魯長葆（忠修），湖南人，亦係軍人出身，尚係魯詠庵（濂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時到浙的。年齡資歷，均長於我。因為他們兩人，皆係軍人，而衢州與金華是近鄰，皆為浙贛鐵路沿線的大站。乃與他們談了一些一旦對日戰事發生金衢兩屬應如何聯防的事。魯因為與黃朱兩任主席均不太熟，他只是奉省政府之令行事，沒有什麼特殊的作為。晚飯以後，我與友人信步出城，沿衢江散步了一會。再回城的時候，城門口的站崗哨兵忽然要問我們口令，我才想起衢州有四省邊區主任駐紮，地位重要。但既未宣告戒嚴，時間又未到午夜，為什麼要對行人問口令？我正想取出印有官職的名片，證明我的身份。而那同行的朋友，却已立即應聲道：「老百姓」，哨兵便放我們二人進了城。我那朋友說：「你是隔壁的長官，雖則兼任區保安司令，係同少將的階級，但是你並沒有穿軍服。你給了他名片，他反而為難。不如說是老百姓，最簡

單明瞭了。」我真是學了一次乖，也可以說「老百姓」三字，真是可貴極了。

五月二日，我曾去了一次麗水。那是奉了省政府之命，代表朱主席去主持第九區社會軍事訓練幹部訓練班開學典禮的。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設在麗水，專員余森文，廣東人，係朱主席在廣州中山學院任教時的學生。第九區所屬為浙江省舊府屬的處州，地處浙南，山多田少，人丁不旺。交通閉塞，文化落後。處屬向有十縣九無城之說，可見其窮。余專員理論很多，辦法也不少。他因為係朱主席的門生，離開省會又太遠，所以常逕代省政府下令行事。我在麗水也住了一晚，與余談了許多。

專員公署沒有自備的交通工具，我到各處或所屬各縣去，皆乘火車或浙江省公路局的班車。沒有鐵路或公路的地方，有船乘船，無船走路。我在到任後不久，大致應該去的地方都去過了，對政情與民俗，也多已有了了解。浙省內地各縣民情淳厚，地方父老均尊重讀書人。並且家家釀酒，用以待客。內地沒有娛樂場所，人民沒有休閒生活。有之，則讀書人好吟詩，一般人善飲酒。我的酒量本來不行。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天中午，為朱驪先生在夫子廟六華春灌得大醉了一次，睡了一個下午，才清醒過來。朱先生酒量既大，酒興又好，他自從那一次知道我酒量不行，就不再勉強我多飲。我到了蘭谿金華之後，地方人士不免招待吃飯。內地少有菜館，多由家人自行烹調，其意甚誠，不能不領。我知道他們都會飲酒，從來不敢貪杯。那知道我第一次到永康縣

，住在面臨河邊的泰來旅館。店東為程健樵（士毅），竟將我灌得大醉，整整睡了半天一夜。程也是永康縣商會的會長，慷慨正直。後來戰事發生，對地方盡了很多力量。從此，大家知道我不善飲，也就不再勉強我飲酒了。

我將專署移到金華之後，第一件事是要廢除門崗。凡有來賓，皆可自由出入。吳副司令認為不可，因區司令部與專員公署係用同一個大門，事實上天寧寺只有門框，早無大門。他說：「區司令部是軍事機關，一定要保持軍事體制。」我乃採用折衷辦法，門崗照設，但只能查詢着軍服的來賓，也只對着軍服者出入時立正敬禮。對於着便服的來賓，不得查詢，也不必立正敬禮。我是假定着軍服者係來區保安司令部接洽公務者。着便服者，係到專員公署者。

其次，我廢除了立在我辦公室門口的衛兵，也廢除了我出外時的隨從。吳副司令最初也說是體制有關，我堅持廢除，他也只可同意。我初到蘭谿與金華的時候，我常到街上走動，照例有兩名到四名衛兵，手持木壳鎗，不離左右，我深以為不慣。尤其偶爾我坐人力車，而衛兵持鎗步行追隨，有類上法場的情形，路人固然側目，自己也覺得可笑。我後來才知道任我的侍衛的兵士，每月另有賞給，每人二元，我乃仍在我的薪津項下照付，不要區司令部開支，却免除他們的站立與奔跑。

區司令部的同仁，都對我很好。我看他們也皆很努力，知服從。惟有參謀邵才，湯溪人，頗好多事，且說話隨便。我想如能將其調走，則署

部之中，就不會有任何人事問題。但如省保安司令部又另派一位多事的人來，則一動反不如一靜。我在赴麗水開會的時候，看到第九區保安司令部的參謀，至為篤實。我向他問明了姓名籍貫，才知道他名叫定邦，廣西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資歷甚好，與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季寬（紹斌），係同鄉同學，却屈就在此。可見他不善奔競，也不恥低就。我於下一次到杭州的時候，就請宣鐵吾兄將其調到四區來，宣答應了。邵才調往何處，我就不知道了。以參謀調來之後，對於區司令部的的工作，幫了我不少的忙。至於副官，原來是杜文岳與葉潤璋，皆勤勞負責，頗為得力。軍法官原為錢壽庚，後為龐治章，兩人均係中央政治學校的畢業生。專員照例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委兼軍法官，對依法交由軍法官審判的案件，有審判或復判權。事實上，則由省保安司令部派來的軍法官承辦。凡開庭、詢問、判決、乃至執行，均由他擔任。抗戰開始，蘇浙邊區主任張向華（發奎），給我一份電令，說是：「此後捕獲漢奸，即予就地正法。」其時，張的公署在嘉興，而閩浙贛皖四省邊區主任公署，則在金華的鄰邑衢州。為什麼在軍法系統上將金華劃到蘇浙邊區公署管轄，我始終不了解。

抗戰開始之後，各縣捕獲的漢奸不少。我認為必須由我自己慎重審理，才能不致造成冤獄。日間公忙，又常有空襲警報，乃多於晚間開庭，由軍法官幫同審問。我細細研究之後，發覺其中無一案係有確實證據者。當時各縣所捕來的嫌疑人犯，不外兩種：一是說他們在空襲警報發出後，

不遵守防空疏散的規定，反而有指引敵機投彈目標的行爲，如燃點火柴，或用白紙在地面上搖動等。一是說他們在水井中用白色粉末下毒，但並沒有找到白粉。其中有一案係義烏縣政府解來者，同案人犯有十餘人。縣政府初審，認定他們是由上海的日軍派出來的。經我詢問後，他們皆是鄉下人，從來未曾到過上海。口供所述，皆係刑求而得。並且將地名人名，全弄錯了。我想，鄉下人沒有防空常識，警報發出後不知疏散，仍就取火抽煙，是難免的。敵機出來轟炸，其上級均領有地圖，指明了目標，何須臨時看地面上的一根火柴的火光或是一張白紙？而且在地面上的這一根火柴的火光或是白紙，在白天的高空飛行中，又怎能看得清楚？於是我乃全部予以平反，當庭釋放。各縣知道我如此重視漢奸案件，一定要親自複審，也就不敢隨便抓人，以圖邀功了。

(叁)

朱主席曾於民國十六年，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十年以後，他重臨故鄉，擔任主席，亦仍自兼民政廳廳長。他到任之後，求治心切。對各縣縣長，調動頻繁。半年之中，已有全省過半數縣份，縣長換了新人。也有一縣在幾個月之中，更換縣長兩次到三次者。真是五日京兆，席不暇暖。當時第四區各縣的縣長是：金華章駒，蘭谿陳佑華，義烏章松年，永康白深樓，浦江徐志道，武義金平歐，湯溪王重輝，桐廬朱海棧，建德江起鯨，東陽程毓岳，分水鐘詩傑。其中就有好幾位，是朱主席到任之後新委的。

朱主席也最恨貪污，因而對於匿名控告的信件，或是各縣地方報紙所載貪瀆的消息，至爲重視。他用了許多人，處理控告信，並每天剪地方報紙的新聞送給他自已看。他或則派省府或民政廳的視察人員，到各縣澈查。或則令各區專員，就近查復。我到職之後，正逢到他查案興趣最高的時期。每天忙於接待由杭州來的查案人員，也忙於拆閱從省政府發來的緊急令查的公文。對於前者，我要協助他們查；對於後者，我要自己或派人查。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忙碌，我了解朱主席的作法，並不能達到他勸精圖治的要求，而且是正中了地方豪紳訟棍的奸計。我查出有些縣份，有人專門告狀，也有人專刻木質圖章，蓋在控告信上。每一顆小小的長方形木塊，可以上下四方，刻六個不同的姓名。而這些姓名，全屬偽造。如果照其所控告的案情而言，又皆是十大罪狀，並且每一項罪狀，皆是可以判處死刑的。他們有一句口號，叫做「只求查，不求辦。」意思是說只要上級政府受理調查，他們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他們也明知道所控不實，上級是無法辦的。他們爲了打擊政府的威信，阻擾政令的推行，隨時用幾分錢郵票，就可以匿名控告，或是散佈謠言，利用記者，在地方報紙刊布不實的報導。適逢朱主席有告就查，他們乃更爲得意。於是控案就越來越多，省政府及各區專員忙碌不堪。而各機關人員則人人自危，無心做事。地方小邑，經不起道路傳聞，更經不起政治風暴。老百姓只要一聽說某人有家被查，對他的命令，就心存觀望，甚至

不願遵辦。待事後查明原控係事屬烏有，毋庸置議，被控的人名譽與精神，已受到重大損害，難以補償。我以朱主席約我任職，曾一再地以中日戰爭即在目前，要我回桑梓服務共赴國難爲言。則人事的安定，應爲第一要義。我乃親到杭州，向朱主席陳述我的意見。

我首先說明我在地方所見所聞，浙江省的政風確屬良好，並沒有什麼貪污瀆職的事。一方面因爲浙江省各級行政人員水準較高，二方面因爲公務員的待遇不薄，足以養廉。其時在內地各縣，每月有一二十元的收入，就可以贍養一個小家庭。本地人在本地做事，家中總有幾畝田與幾間屋，食住無憂，誰也不願意爲了小利自毀其家聲，使得此後不能在家鄉立足。朱主席所用的人，多出身於教育界，尤其愛惜羽毛，珍重前程。教育界人士，也就是一般人所常說的讀書人，他所重視的不是名，更不是利，而是能受到信任與尊重。今如隨時更動，有控就查，就是表示上級對他信任不專，與尊重不足，這是讀書人最認爲痛苦的事情，與朱主席平時所說的求賢若渴，愛才若命，完全相反。我建議他此後要力求縣長及各機關主官人事的安定，並且不再理會匿名的控告信件。匿名就是不負責任，省政府沒有理會的必要。況我國訴訟法規定，原告本應負舉證之責，匿名函件多未舉證，自不必就先派查。如果控告人雖具有真實姓名地址，却提不出證據，省政府不能就憑其一面之詞，也應先通知其補提證據，並允其代爲保密，才行澈查。至於地方報紙，每與地方派系有關。恩怨所涉，所載每欠公允。

以主席綜攬一省政務之忙，而要遍開各縣專報，未免過於辛苦。朱主席聽我說到此點，不免失笑。況各區專員，比主席要早幾天看到當地的報紙，自會斟酌虛實，就地查詢。

我又舉了幾件例證，說明這些案件，在初聽到時，真是嚴重之至。但經過調查之後，却完全係子虛之詞，連附會都談不上。像這樣的查案，徒然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並且延誤了若干應辦的正事。至於造成各級人員的離心離德，尤與團結人心共赴國難的大計相違。朱主席聽了我的陳述，說：「也已經有許多人對我說過，要改變辦法，但不如兄說得透澈。此後只有加重各區專員的責任，為省政府盡到察吏安民的目的。」朱主席從善如流，果然，地方行政人員的人事趨於安定，控案非有實據，不再派查。

我自己則於到專署之後，就首先開照辦理事務人員，不許開假發票，不許拿商人的回扣。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先父任浙江省司法廳廳長，約周佩芳君辦總務。周、餘姚人，先父於民國初年在杭州創辦浙江印刷公司，周任經理。接事的第二天下午，周到我家中向先父請示，說是文具店送了發票來，說明有若干的中用，已經開在數字裡面。周說不要，請該店照實數開，店中人說：各機關皆如此，如少開了，使別的機關不好辦。先父乃在發票上寫道：「照幾折付，作訖」，周就持去付款，以後各種付款也就皆如此辦。其時尚未有會計制度，也未有審計制度，更沒有統一發票。我在旁邊看了，就覺得從政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就以此事告知署部的同事，他們也

樂於遵辦。只是他們說：「有時候，真發票會遭審計機關剔除，不得不另外準備假的。」我說：「絕對不可以。審計處如將真實的發票剔除，我們應該申復。如果一再的申復還是剔除，那就由我個人賠了算了。總之，決不用假發票」。後來事實證明會計處與審計處對於具有理由的真實發票，雖則數字超過了原來的規定，也還是予以核銷，最多加上幾句以後要特別注意等幾句官話，並沒有要我賠墊。可見要用假發票，要造報銷，乃是總務人員的積習，也是他們的一種藉口。

專員公署與區保安司令部的經費，當時皆由省政府照預算十足撥發。我向來用錢很省，同人也都奉公守法，勤儉成習。所以每月均有積餘，也就從來沒有因為金錢的事，發生過煩惱。至於我個人，則因金華物價甚為便宜，白米一石，合一百六十斤，不足四元，豬肉每元可買七斤，雞蛋每元可得三百枚，蔬菜價錢更低。在飯館中宴客，一席不過四元。我任行政督察專員的薪津，每月於扣除所得稅及印花後，尚有三百八十四元二角；另有辦公費二百元。又兼區保安司令，每月扣所得稅及印花後，另有七十三元五角。家用除房租伙食及傭工工資外，別無甚多的開支。因此，我在金華時，所有往返杭州，或至他縣的來回川旅用費，及平時宴客，送禮，招待過訪人士，及應付各種捐款，均由我自己付錢，從來不報公賬，未由專署支付。就是這樣，每月還是有一半的錢，可以多餘。

朱主席治事甚勤，每有會議，他必先時到達。他為了解地方情況，或指示政令，常於晚間與

各區專員或各縣縣長通長途電話。浙江省的長途電話網，在民國十八年間就已經完成，為全國各省中之最早者。並且長途電話線全部用銅線，其時交通部電信總局所用者，尚係鐵線，這是浙江省電話局首任局長李振吾（熙謀）兄的功績。李並且定下了兩種辦法，一是晚間八時以後接長途電話，半價收費；一是稱為通知電話，類似電報，用文字送達。關於浙江省長途電話建設的經過，李兄曾寫有專文記述，載東方雜誌復刊第五卷第九期（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出版）。朱主席之以要在晚間接電話，並不是為了半價，而是他白天太忙。抗戰發生之後，白天也經常有空襲警報。我因為朱主席常於晚間來電話有所指示，必須每晚在專署等候。有時，還要立即將他的指示，再用長途電話轉知所屬各縣的縣長。四區所屬有十一個縣，也就要重複地將其指示說十一遍，或是再加上我的處理辦法。朱是習科學的，頗為重視效率。他在長途電話中的指示，紀錄下來，就等於命令，正式歸入檔案。我對所屬各縣縣長所說的，也是一樣。抗戰發生之後，緊急的事情增多，晚間的長途電話會談也加多了，每晚就常有二次或三次。

金華的電話局主任姓李，嘉善縣人。我只於我初到金華時，見過一面。有一天，他忽然來看我。吞吞吐吐，說了好久，辭不達意，我未能了解。我看他似乎來意甚誠，而又似有難言之隱。我乃保證他守密，要他能暢所欲言。他才告訴我：「某機構的主官×××，派人到電話局來，要查朱主席晚間與我在長途電話中所談的是些什

慶事。並且表示每月送大洋二十元，給局中的接線小姐加餐。」他接着說：「我不能這樣做，已經婉却了。但是如果×××要派人到電話局來竊聽，我是沒有力量阻擋的。」我說：「你的上級係浙江省電話局，電話局的上級係浙江省建設廳，建設廳的上級係浙江省政府。你可以逐級報告上去，使朱主席知道，有人要查他與我在長途電話中談的是什麼事。」李主任說：「我不能，也不敢向上級報」，他就告辭了。有一次，我到杭州，與保安處處長宣鐵吾兄談起此事。鐵吾兄說：「×××要偷聽電話，真是荒謬。我要問他是奉了誰的命令？兄爲區保安司令，負有地方治安的責任，倒是可以命令電信局，注意可疑的電話。」但是我平時最不喜歡做偷聽的事，遂沒有要金華電話局李局長照做。

季局長所說的×××，曾因金華當地的兩家報紙，浙東民報與金聲日報，經常以專員公署的消息，作爲頭條新聞，認爲對於他所發的消息，未予重視，派人對兩報的負責人質問。兩報不得已，也間或將他的大名，在頭條刊出。但是，專員公署管的事多，來往的人多，與地方的關係多，自然新聞也多。我平時最不自我標榜，也不喜自我宣傳。但是有記者來訪，我必親自接見。有問，在可能公開的範圍中，也必予以解答。我總覺得能透過報紙，使民間了解得愈多愈好。簾高堂遠的神秘時期，是不合乎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的。

有一晚，金華商會會長程世裕，請我吃晚飯，×××也被邀。同座的，尚有地方人士多人，

如省立金華中學校長方叔新（豪），交通銀行經理王質園，電燈公司經理蔣蓮僧，也均在場。主人先排定了席次，他們尊重地方官，將我列爲首座，他是二座。酒過三巡，他開口了：「我是保定軍校出身，是真正的陸軍少將，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只是同少將階級，你們竟不知道階級的高低，而排錯了位置。」主人絕沒有想到他會當場說出這樣的話來，自然不便開口，陪客也皆默然，我也未表示意見。於是這一餐飯，就因爲他的一言，主賓皆感到不歡，匆匆散席。

次日，王質園先生來看我，說是×××昨晚對程會長說，要他重新請一次客，排他坐首席。地方上各位先生恐先生不願意，特地推他來向我說明。並且仍發一張請帖給我，但是我以不到。我說：「現在中日戰爭已經開始，地方需要團結，軍民更是一體。吃一餐飯，坐一次首席，是毫無得失輕重可言的事。地方上各位父老要請我，我一定來，坐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王說：「那麼，準備兩桌好了，你們二位，一人坐一桌。」我說：「×××就是要過一次坐在我上面的癮，就讓他過一次，又何必必要請兩桌，多費錢費事呢？」到了那一天，我如約而往，他坐了首席，志得意揚。地方人士對我的謙沖，皆表贊佩。

(肆)

金華的讀書人很多，地方人才蔚集。當時最爲衆望所歸的，首推王孚川（廷揚）先生，浙人皆尊稱之爲孚老。自國民政府成立，孚老就擔任浙江省政府委員，與先君爲同事。浙江省政府有兩

位年高德劭的委員，另一位是莊崧甫先生，奉化人，後來曾任導淮委員會委員長。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實行清黨的時候，省政府的民政科長（清黨以前省政府分設四科，以後改爲四廳）馬夷初（叙倫），竟扣留代理主任委員（清黨以前省政府探主任委員制，由張靜江先生擔任，以後改稱爲主席）褚慧僧（輔成）先生，誣指他是共產黨。莊王兩位老委員氣憤填膺，上電南京中央，力白其冤，因而二人的直聲，更聞於兩浙。其時馬要在杭州將褚先生就地處刑，中央接到兩老的電報，乃命將褚先生護送到南京去，查明了馬所持有的浙江老共產黨宣中華的日記，其中有關於褚先生的記載，乃係出於另一人的偽造，立即將褚先生恢復自由。此後褚先生就在上海創辦法學院，作育英才。抗戰期間，追隨政府，任國民參政員。三十五年，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獻替甚多。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逝於上海，享年七十七歲。而馬叙倫則於三十八年大陸陷匪後，賣身投靠，參加匪偽組織。忠奸之別，隔了二十二年，始得判明。

民國十七年元月，先君逝世，孚老曾親書挽聯致奠。句爲：

不談星命，不惑仙佛，不問岐黃。早徹死生觀，自具有超凡見解。

也讀詩書，也學法令，也任官吏。何分人我相，姑了此入世因緣。

我自法國回國以後，以迄我奉命到金華之前，每到杭州，必去拜見孚老。他與我家同住在英士街，他家在東頭，近弼教坊；我家在吳山路口

，近湖濱。他又擔任浙江省黨部監察委員，他每次均與我談得很多。論人論事，均極為公正。而我奉命到金華之時，他却以老病逝於杭寓。四月十七日設奠，我敬挽以一聯：

卅年父執，稀若晨星。早歲挹清芬，憶從負笈航行，會荷書貯徐孺子。

八婺香英，浸成碩果。幹材治河里，正值謳歌衣請謁，那堪殿祀魯靈光。

當時在金華城中的士人，尚有王質園與方倏新兩先生，他們都是北京大學畢業的。王在金華，任交通銀行分行經理，我到金後始行認識。知道他喜讀書，富收藏，能詩文。方任省立金華中學校長，他於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代表北京的大學生到杭州來講演，我就在省教育會的禮堂中見過他。其時，我是省立第一中學的二年級的學生。杭州各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與杭州學生聯合會，都是大家因為聽了他的講演，才發動成立的。倏新兄因為知道我對於教書有興趣，而省立金中在當時金華城內，已經是最高學府，他便約我在他的學校中，兼任高中三年級的公民教課。我於每星期三上午十時到十二時，在金中授課。湊巧的是校中原來用的公民課本，就是南京正中書局出版的，而其中的一冊法律大意，正是我自己所寫的。正中的公民課本當時在全國各省縣均至為暢銷，但由作者自行任教，則我是第一人。尤其像金華這樣較為內地的一所中學，而能由我這位原著者自己講授，更是難得。在我雖已任大學教授數年，但任中學教員，這也還是第一次。尤其學風純樸，學生用功，所以我頗引

以為榮。

六月十九日，我因暑假即將開始，特於下午四時在專署大禮堂，以茶會招待應屆畢業的金華中學、縣立中學、作新中學、成美女中、八婺女中各校的男女學生。並以名畫一幅，頒贈給高中畢業會考的第一名。這在金華，是過去未曾有過的盛會。地方人士對我之注重教育，作育青年，至表好感。

另有一位黃百新（人望）先生，也是金華人，也是北大的早期畢業生。民國十三年間，馬叙任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黃任省立一中的校長。因二人皆與北大有關，浙人乃稱之為螞蝗黨（諧音馬黃二字）。後來，黃的夫人逝世，娶馬的義女為繼室，二人乃由好友成為翁婿。而二人的意見，却愈離愈遠，平時不常有來往。

百新先生博聞強記，四書十三經皆可以背誦。平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又豪於酒量，善於猜拳，自命為科學拳，戰無不勝。任何地方只要有他在座，主客無不盡歡。他當時在浙江省政府任視察，但常常回金華來。有一天，浙江高等法院金華分院院長鄭雅山（澧），約他午飯，邀我作陪。他向我挑戰，要猜一百二十拳。人人都知道我不能飲，皆為我捏一把汗。幸而我只輸了五十拳，他却輸了七十拳。他說：「奇怪，我的科學拳攻無不克，怎麼會輸給你？」我說：「因為我是哲學拳」，舉座皆大笑。幸而這一天是星期日，這頓午飯，一直吃到下午五時，方得散席。雖則所用的酒杯不大，而連盡五十杯，也已經是

我平生猜拳喝酒的最高紀錄。

金華還有一位蔣蓮僧先生，當時已近七十歲，能詩能畫，却是民營的電燈公司總經理。他的國學根基很好，並且為人極為正派。另有一位金品琅先生，當時也已在六七十歲之間，任私立八婺女子初級中學的校長多年，桃李滿門，為地方所推重。

抗戰開始，旅外的人士紛紛返籍，如金華的徐壽城（東藩）先生，向在外交界服務，回到長山家中。義烏的朱郁堂（獻文）先生，是在司法界負有盛名的，回到金華居住。永康的呂戴之（公望）先生，曾因反對袁世凱稱帝，宣告浙江獨立，擔任過浙江的省長兼都督，也回到永康家中。以上皆是舊金華府屬的人士。又如龍游的余穉園（紹宋）先生，向以詩文書畫，冠絕一時，也回到沐塵。他雖則是舊衢州府屬的人士，却常到金華來。又如何柏丞（炳松）先生，是金華人，在上海任暨南大學校長，因關懷戰爭中的桑梓，也回來幾次。加之，國立同濟大學，與省立杭州高級中學，是抗戰後首先奉命遷移到金華來的。同濟的校長翁之龍兄與杭高的校長項定榮兄及各位教師，均到了金華。同濟暫在城內復課，杭高則在鄉間的瑣園開學。我曾特地到瑣園去了一次，對杭高的全體同學講演。

我在金華，除與教育界及文士來往較多外，也常到鄉間去與老農閒話桑麻。每逢星期假日，就與二三同仁，出迎恩門或西大門，步行下鄉訪問鄉民，因而到了不少地方，也順便遊覽了許多名勝。但自抗戰開始，晚間常要辦公到午夜三四

時，才能休息。星期日的例假，也自動取消，就難再有郊行的機會。

金華北山的三洞，即雙龍洞，水壺洞，與朝真洞，為著名的勝景之區。其旁的西吳，則盛產佛手與珠蘭。我因陪同親友遊覽，均去過多次。二十六年六月，先岳父錢逸塵公從南京到杭州，再與內子同到金華，住了幾天，他們仍返京杭。他在暢遊了三洞之後，回到我所住的浙東旅社，就寫了三首詩：

洞裡神仙洞口舟，真嗟牽曳誤前修。壓胸奇氣思鞭石，出世因緣笑枕流。龍象偶招滄海客，雲山況是赤松游。芒鞋竹杖閒依倚，笑聽兒童說細侯（雙龍洞）。

雲封双洞僅通泉，泉口舟牽上瀨船。石底臥游天一線，岩中奇境炬雙燃。仙衣不共龍蛇蛻，鐘乳長同日月懸。卻謝桃花源裡客，一回鷄黍喜周旋（雙龍洞和童壹甫（杭時）題壁原韻）。

崖崩石裂瀑飛空，九折危欄屈曲通。海若鳴琴驚異響，地中行水識神功。便如擣穴聲威壯，疑是呼龍變化工。獨有幽奇勝雄放，怡然對此滌煩胸（水壺洞）。

抗戰之後，陳寥士君過金華，遊了三洞，也曾留詩，特地寫了送給我：

金華北山

卅六洞中天，泓崢境已仙。雙龍耕白水，一石挂蒼烟。方謝追人表，金元逼眼前。水廉

飛淨瀑，乞取盪腥膻。

挈子孝旅遊雙龍洞水壺洞

華谿六七里，谿聲去不息。宛轉龍赴壑，奔騰珠鬪雪。耳際晴雷喧，動極反靜極。仙露朝未晞，谿草耀紺碧。沿谿萬紅樹，掩映明媚絕。葉色綠為素，霜侵始改質。惟有流水音，古今無變易。

外洞虛且廣，內洞極冥官。洞中更探洞，輕舸曳淺沼。乘炬前作導，雲物乃了了。青龍蟠其左，蒼龍向右掉。鱗角與鬚爪，湧現霄天矯。獅象龜鼠蛇，神似出意表。仙人掛衣處，霞光猶繞繞。暖曖玉女旁，千歲不肯曉。卅六品洞元，仙蹤追窈窕。

水壺未成水，浪浪瀉寒瀑。聞聲未見影，瀑乃藏洞腹。仄徑三十丈，維井不須索。飛龍瞰水廉，神秘妙含著。直下摩石笋，青玉涼可掬。瀑自天外來，又向關澗伏。來去兩詭奇，福地天下獨。

雙龍若石屋，但無此寥廓。水壺若水樂，更無此連曲。明洞連暗洞，洞口懸洞腹。洞外瀉寒泉，洞中飛水瀑。更有朝真洞，一線巢萬蝠。方纔作行紀，遺民垂芳躅。何處非新亭，哀歌振林谷。浙東多流人，慷慨謀規復。剩水殘山間，依然南宋局。

金華城內的名勝八詠樓，係沈約所建，原名元暢樓。沈約在齊代的隆昌初年，曾任金華太守

，並作有八詠詩。金華到現在尚有八詠門，為鄉人來往的孔道。唐朝的嚴維曾有句謂：「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少年為客處，今日送君遊。」崔灑，謝朓，均曾有題八詠樓的詩。李清照也有登八詠樓的七絕：「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南十四州。」她對八詠樓，可謂推重之至。現在的八詠樓是清初重建的，我在金華的時候，為金嚴師管區司令部借作辦公之用。

金華城南，尚有一所明月樓，倚城而建，亦為勝蹟之一。我在金華的時候，則為浙江省保安處的軍醫院所使用。但地方人士，有時仍在樓上宴集，暢談地方政事。

我到金華之初，就注意地方的文獻。首先，我要各縣徵集志書，但未有效果。徐壽城（東藩）先生對地方文物，平時至為留心，他在南京寫信給我，要我整修金華朱大典公的牌坊。朱係明萬曆四十四年的進士，崇禎時任山東巡撫，河運總督。福王在南京時，授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後抗拒滿清，退守金華。力盡，正衣冠，率其夫人及子媳諸孫等北拜，在八詠樓用火藥自焚，保明末殉難最烈之人。清康熙時封贈諡法，飭建牌坊。我乃親往訪謁，確已年久失修。又大典公尚有手筆「是岸」二字，刻在石碑上，在長山小學第二部，我也親自去看了，並且發見了大典公的像碑，也在該校內。該校尚有李陽水寫的正楷「天清地寧」四字的刻碑，但未書年月。

我在金華，常常應約講演。所有各種集會，必須由我講話。幸而我任教授多年，尚能勝任。

其間較重要的講演，如七月十八日，我在金華各機關聯合紀念週，講今後中國文化建設之方針。七月二十七日，我在省縣合辦的第七學區小學師資暑期訓練班，講教育家與建國大業。八月十三日，我在金華縣短期小學師資訓練班，講中華民國永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八月二十七日，祭孔。地方紳耆到者甚多，均坐在前排。我講孔子的學說，頗為他們所讚佩。事後，宿儒蔣蓮僧先生對我說：「初以兄年青，又為留學生，未必能知我國儒家的精義。今聆所講，深悔未早日請教。」

我才知道，在地方任事，要得到當地才識之士的尊重與合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伍)

我在金華擔任浙江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的期間，正逢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此項選舉原由國民政府規定在民國二十五年舉行，其後又奉令延至二十六年，我乃適逢其會，省府派我為浙江省的第六區選舉監督。七月二十日，職業代表選舉投票；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區域代表選舉投票，二十四日起開票。幸而我事先規劃得很周密，一再關照選務工作人員，務必公正，慎重，及廉潔，選舉乃辦理得很順利。

至於我自己，原也在第一選舉區任候選人，這是上一年決定的。我到金華之前，曾請示過主席，既然到浙江來任地方官，需否放棄候選。他說：第一選舉區不在兄管轄範圍之內，法既不禁，自無須迴避。但因我在金華，主持選務，自無暇再到第一選舉區作競選活動，只得託拜友人

代為進行。開票結果，我以二、三、六、一、六八票當選。我現在可以特別指出的，就是當年的選舉，沒有任何候選人化過錢，不但沒有人買票，也沒有請客。其時既沒有政見發表會，也沒有助選員。我自己就沒有化錢，這是我自己知道的。我當選了十年之後，也就是民國三十五年的十一月，制憲國民大會才得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開幕，我也才得出席大會。關於我參加制憲的經過，我曾寫了一本制憲日記，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朱主席因為要準備應付中日戰爭的發生，很注意明耻教戰的工作。他到任不久，就下令舉辦各區的社會軍事訓練幹部訓練班，全省按九個行政督察區，分設九個班，以各區的專員兼司令擔任班主任，就所屬各縣，每十保遴選保長一人到班受訓三個月。原意是陸續調訓，使全省各縣的保長，均能受軍事訓練，而後再由他們訓練本保的壯丁，使得人人皆能具有軍事常識。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可起而衛國。但因中日戰爭在七月七日就已經發生，第一期提先於八月一日結業，以後各期就未能續辦。

第四區所屬十一縣的第一期調訓，適值農忙時期，仍到遴訓保長五百二十九人，超過省定額數二十七人。原定四月二十日開訓，因專員更動及專員公署遷址金華，故延至五月十日開始，以前龍游地方銀行舊址為大隊部，共編為四個中隊。第一及第二中隊駐大成殿，第三中隊駐天后宮，第四中隊駐東嶽廟。我國已經多年民不知兵，所以這一種訓練，在內地係屬空前的大事，極為民間所重視。開訓典禮於五月十五日舉行，自此

以至結業，每有集會或是典禮，我均親自主持並致詞。我並且在訓練期間，舉辦了一次軍事競賽會，運動項目達五十三種之多。

在社訓班辦理期中，我曾有一次在杭州見朱主席，談到社訓班的經費問題。他問我原定的預算是否足用，我說不足，除超額受訓人員的伙食，已令由其原縣負擔外，尚須請省政府准予追加。其時，賀培心（揚靈）兄也在座，朱就問他：「三區不够用？」賀答：「够了。」朱就未再有任何表示。我們告辭出來，我就問賀：「紹興的米價比金華貴，你怎麼會够了？」賀說：「當然不够。但是要追加預算，手續麻煩之至。不知何月何日，才能領到錢。不如回去要各縣各鄉分攤了，反而方便。我們只要不貪污，由地方多出一點錢是可以的。」我聽了他的話，方恍然大悟。但是我不願意開攤派之門，仍就辦了追加預算。果然，半年之後，省府方將款項撥到。

因為社訓班提前結訓，而追加預算又已奉准。錢雖尚未領到，但在賬面上係屬有了餘款。我乃報請省政府准予將餘款辦理第四區救護訓練班，於八月二十五日開學，受訓期間為三星期。由所屬十一縣保送具有初中畢業程度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男子一百五十名，到班受訓。另招收具有小學畢業程度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之女子三十名為走讀生。這在當時地方風氣閉塞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形下，也是一件創舉。辦法宣布之後，要求參加的人居然很多。但因經費有限，無法擴充名額。只能希望學員結業回縣之後，以一傳十，以十授百，普及戰時救護的常

識。其時浙江全省沒有一所省立醫院，金華只有一所由省保安處所設的軍醫院，地址在城隍廟，其後即為金華的名勝明月樓。另有由教會設立的福音醫院，與私人設立的智珠醫院與普濟醫院。我將各醫院的醫生均動員了，到救護班擔任講課，並指導實習。男生以軍醫院為班址，女生則以東嶽宮為班址。我請軍醫院院長任班主任，福音醫院醫師葉希華的夫人陳金鈴女士任女生的訓育隊長。而他們則推我為救護班的創辦人，經常到班講話及批改學員的國文試卷。我並且選錄了若干首古詩，如阮籍的詠懷之一，張華的壯士篇，陳子昂的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杜甫的後出塞，岳飛的送紫巖北伐，張琰的出塞曲，給男女學員，作為課餘吟唱的題材，以激勵男女青年的志氣。

抗戰一經開始，在地方上隨之而來的，有三件大事。一是防空，一是難民的救濟，一是傷兵的收容。

關於防空，浙江省因已有全省的長途電話網，每縣每鄉鎮，均可用電話聯絡，也均已設立了防空監視哨。所以關於空襲警報的傳遞與發佈，甚為迅速。

八一三戰事方起，八一四，杭州即遭敵機轟炸。下午五時許，有日機一隊襲杭，當由我空軍飛升，與之戰鬥。空戰約一小時半，為我方擊落日機三架，我機並無損失。日機轟炸目標為寬橋航空學校，市區並未投彈。這是杭州第一次遭受空襲，也就是八一四空軍節的由來。日機戰敗之後，紛紛逃走。其中一架，墜落在浦江縣西北鄉朱宅村附近的淡塢山山中，機身全燬。機上原有

敵方空軍七人，六人已死，生俘了恩地五郎一名。這是在我管轄區內發生的事件，也是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之後第一名日本空軍的俘虜。鄉下的老百姓從沒有看見過飛機，更沒有看到過日本空軍。而這一位恩地五郎又言語不通，當地的軍警人員，無法與之交談。幸而浦江縣的縣長徐志道很能辦事，我也與之打了幾次長途電話，決定將死者就地埋葬，當地人民如要誦經超度，可聽之。俘虜則送到杭州，交給省保安處。損壞的機身移到浦江縣城內；機上尚有一具降落傘，送到金華，均加具說明，公開陳列。

八一四以後，全省常常有空襲警報，金華的老百姓最初不以為意。我不得不再再的呼籲大家注意防空，實行疏散。省方只於七月下旬，指定我為防空支會的會長，並頒發了一些宣傳用的標語。我乃訂定注意事項，又設法籌款，建築公共防空壕洞，舉辦防空演習。八月十二日夜，首次實施燈火管制，並首先在中山公園內建大防空洞，以為示範。金華城原有小丘陵，地質甚硬，而本地又產木材，所缺乏的只是沙包。要做沙包必須要有麻袋，麻袋又必須要到杭州去買。浙江省審計處規定每隻麻袋的價格是小洋二角。但因需要者太多，各地都派人去買，已漲到每隻二角二分。如果不買，勢必再漲。專員公署派去採購的人，恐怕日後審計處不予核銷，不敢決定。我乃即電省審計處長劉文海兄，問他是否也在做防空洞，所用麻袋是多少钱一隻？劉回電說，准予實報實銷，問題才告解決。

我的柴場巷家中，也由內子自己督工，在天

井中掘地丈餘，支以木柱，覆以沙包，建了一所防空洞。因四圍皆係石壁，可稱得上堅固。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金華城區大轟炸，我們均在此洞中。適一彈落於牆外的作新中學，此洞竟仍受震甚烈。在洞中的人，多跌倒在地。

九月二十六日，金華第一次遭受敵機轟炸，在車站旁落彈六枚，炸死老百姓十二人，傷二十三人。十月十二日，第二次遭炸，彈仍落在車站附近。其時人民已經知道疏散，且金華全城，已由我的督促，建成了四百五十五所防空壕洞，所以沒有人死傷。此後每逢晴天或月夜，必一日有二次的空襲警報，但轟炸的次數並不多，也從未在車站以外找目標。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失守。二十六日，敵機兩架竄入城空，瘋狂投彈六十餘枚。金華縣政府，電話局，所得稅辦事處，警士教練所，作新中學均被炸。但因防空壕洞的普遍，死傷者只有七人。時值天寒歲暮，風雪交加，城中的文武機關紛紛向郊外遷移。金華縣政府與地政處及田賦征收處，遷至距城十里的東關，第十預備師團遷往雅畝鎮，金嚴師管區司令部自金華遭受敵機轟炸後，即已遷至城外的民房。高等法院金華分院遷往武義縣，金華地方法院遷往康村。至民間也扶老携幼，肩挑背負，向四鄉奔逃。商店全部歇業，城中並柴米均不可得，要到距城十里外的東關，才能買到日用品。向來遇事就要來陳情的金華商會會長程世榕，也留下了一封信給我，說是年老不能再受驚嚇，移鄉居住，悄悄地走了。到了年底，城中只剩下五十個老百姓，沒有遷走。第四行政督察區所屬有十一縣，也

有人建議我將專員公署遷至武義縣，也有人建議先遷出金華城，到郊區的羅店或王坦，我皆以爲不可，決定留在城內。此時只有胡健中兄主持的東南日報，於杭州危急前，派嚴芝芳持函到金華來看我，要遷到金華出版，我當表歡迎，並予支助。在金華出版之後，健中兄聽說我不遷，也決定仍留在金華城內。

至於內子，因正在懷孕期間，於金華第一次遭受轟炸之後，即由金維楷與維堅昆仲，來接我到距城十華里的馬鞍山金家的老家中暫住。維楷是我杭州英士街家中的房客，抗戰發生，他們皆回原籍。後來因馬鞍山距金華至蘭谿的公路線太近，仍爲敵機盤旋的目標，而內子臨盆的日期又漸行接近，乃再遷至武義縣的西祠巷九號，賃三間民房暫住，房東名陳章甫。十二月二十二日，係多至日，我於黎明六時接到長途電話，謂內子將臨盆，而武義縣並無產科醫生。時金華在迭次轟炸之後，全城人民均已逃亡，也無法覓得醫生，我只得打電話到蘭谿縣去聘請。在尚未洽妥之前，七時半，又接到武義來的長途電話，說是內子已安產一兒，係由兩位逃難在武義的友人的夫人，臨時湊合代爲接生的。一位原是習產科的，曾在杭州開業，是姜卿雲兄的夫人應時秀，她並且是武義人。不過她從杭州逃難回籍，並沒有攜帶醫療器具。一位是陳佑華兄的夫人，宣平人，也正逃難住在武義。她原習護士，不過她在結婚之後，也已多年未曾再用其所學。這時，他們聽說內子要生產，又找不到產科醫生，遂出而相助。此兒後來由我夫婦命名爲大正，他出生後第

三天，杭州就陷於敵手。我因爲職責重要，公務忙碌，在大正出生後三天，才能抽空到武義去一視產婦與嬰兒。

內子住在武義的時期，金華日在空襲警報之中。大兒大元時方六歲，從其母居住。他於每次警報之後，必走五里路，登上一座小的丘陵，遠眺金華是否因轟炸而起火。山低，路遠，人小，大元當然是看不到金華的。

關於難民，在戰事發生之初，並不嚴重。只是原籍在內地而向在京、滬、杭一帶的人士，紛紛回籍。他們都各有老家，可以居住。鄉間物價便宜，短期內生活也皆無問題。即使是外鄉人士，只要在內地鄉間，有親戚、朋友、同學、同事，也自有人招待，不必勞動政府。加以內地鄉鎮，有的是祠堂廟宇，要收容難民，也不思沒有地方。十一月以後，由京、滬、杭一帶經過金華而到江西湖南各省的人，漸漸的多了，我常要到車站去接待他們。我勸他們在金華小住，不必急急內遷。但他們皆西行心切，並認爲金華有欠安全。雖知道後來，他們在長沙遭到大火，幸運的也僅僅以身免，而金華仍舊平安。

關於傷兵，確是極爲麻煩的問題。淞滬戰場相持日久，我方動員的兵力甚多，其中有正規的國軍，也有來自各省的地方團隊，素質不齊。其時，杭州是最接近前方的後方，就常有傷兵滋事。後因傷兵人數日多，就向各縣疏運。在第四行政區的轄縣中，金華與蘭谿就到了不少的傷兵。金華原有省保安處的軍醫院，此時加掛了浙江省第五地方臨時補助醫院的牌子，院長由同一人兼

任。又另在郊外竹馬館，係沿金華蘭谿線鐵路的一個小站，設立了軍政部的第十一後方醫院。蘭谿在九月間就到了一千餘人，臨時在祠廟中，設立醫院收容，所派的院長迄未上任。其中重傷者甚少，而以輕傷者爲多。換言之，多能行動自如。他們來自各省，又不免有自命爲勞苦功高者。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言語不通，自易發生隔閡。最困難的是經費，中央遠在南京，撥款很慢。加以主管機關不一，各有各的辦法，而且又常常變更，地方政府每感不知所從。各縣縣政府更受到預算與會計審計法令的限制，不能隨便動用款項。軍事單位，尤其是傷兵醫院，不了解各縣縣政府的困難，事事急如星火，總以爲地方行政機關不重視傷患，故意拖延推諉。我知道了這樣的情形，遲早會發生大事。乃急電請朱主席，特准各縣，爲了應付戰事的需要，凡有關防空，救濟難民，與收容傷兵的開支，先行支用，不受原預算的拘束。日後中央如有款項撥到，再行歸墊，否則即准予作正開支。朱主席在浙省府會議提出，遭到財政廳與會計處的反對。他們拘泥於平時的法令，仍要照平時的手續。朱主席問他們，「你們逃不逃警報？傷兵找到你們，你們有什麼好的應付辦法？」當然，他們也要逃警報，他們也沒有應付傷兵的好辦法。朱主席乃裁定了我的授權請求，下了特令，謂「果屬事機緊迫，不及呈省請示，應准由該專員便宜行事，以資敏捷。至會計方面，如有必需用途，亦得由該機關會計主任會簽後，先行支付，可用暫付款科目登賬。」繼之，朱主席又下令，要我對轄境的省屬各機關以

及保安水警各團隊，隨時考察，並負監督指導及報告之責。再下令，要我對轄區的鐵路、郵政、電報、公路、電話等單位，統籌調整。其有工作疏懈，意存阻礙，或才力不稱，或不足以應付繁劇者，更要我報請更調。朱主席對我的信任之專，與授權範圍之大，真是到了極點。他連直屬於中央交通部而並不屬於省政府的交通單位，都要我監督。但是，金華與蘭谿的傷兵，還是鬧出大事來。

先是，蘭谿的傷兵在到達之後，民間對他們非常崇敬，慰勞甚殷，但他們並不滿足。自第四天起，就發生事端，十日之中，打花船，鬧茶室，毀警察派出所，搶劫亨得利鐘錶行，又揚言要搶中國銀行的分行。勒斃中央教導隊軍用車的司機，大搶諸葛鎮。傷兵醫院中有于斌主教派來的一批天主教的修女，擔任護理工作。共十九人，包括有九個國籍。她們看到了這樣的情形，深以院長不到任，地方政府又不管，感到詫異。蘭谿縣長陳佑華乃出示曉諭，傷兵中還是有人要故意擴大事件。雙十節的早上，有某傷兵用小皮箱裝了一隻老鼠，到當舖中去求當。當舖的伙計，站在高的櫃台中，照例要打開箱子看看當的是什麼東西。箱子一開，老鼠跑了。傷兵說是跑走了他的寶貝，要當舖賠償。當舖當然不肯，於是發生爭執。傷兵是誠心來鬧事的，頃刻之間，大街小巷，秩序發生了擾亂。人民奔避，店舖關門。傷兵乃携了自前方帶回來的機關鎗與手榴彈，包圍了縣政府，割斷了電話線，並滿街大書標語：「打倒漢奸縣長陳佑華」。幸而陳縣長是保定軍校出身，久歷戎行，乃站在縣政府大門口防空洞

的沙包上，對他們講話，要他們立即回到醫院，否則下令警察開鎗。雙方堅持了幾個小時，傷兵才自行解散。另由縣商會出款慰勞，秩序才告恢復。其時尚未有軍人之友社與軍民合作站的設立，地方有事，皆由商會出面解決。

陳縣長在縣政府被圍之初，因縣政府的電話線已被割斷，只由縣公安局給我一份電報，報告此事，說是情勢甚危。傷兵醫院的代理院長，也在半日之中，接連來了三封急電，說將釀大變。蘭谿縣商會會長嚴龍田親自趕到金華，要我拯救全城的生命財產。我既身兼區保安司令，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我相信陳縣長可以應付危局，但總應當在兵力上予以支援。但是陳縣長手中所有的，只是幾十名地方警察，沒有軍隊。而我也沒有軍隊，區保安司令部只有五十四名特務隊，鎗械不齊，子彈不足。浙贛鐵路有一連憲兵，是護路用的，分佈在杭州的江干，一直到江西的南昌，臨時無法集中。金華縣的保安警察隊甫奉令改編為省保安團，新的警察隊尚未成立。其時金華設有金嚴師管區司令部，部址在金華的名勝八詠樓。我到職時，司令原為韓文源，後來韓調往福建，由蕭鍾鈺繼任。蕭，湖北人。及吳中翰調任蘭谿團管區司令，原任金華團管區司令周建陶調往衢縣，遣職亦由其兼任。該部新成立有軍官團，有軍士教導隊，係徵集的在鄉軍人。又有新兵兩營在訓練中，鎗枝齊備。如能派一部份人到蘭谿去，當可對地方有益，遂由蘭谿與金華兩縣的商會會長前往請兵。而得到的答復，是蘭谿有傷兵滋事，未曾接到當地縣長的報告，並不知道

。如要派兵，也要先向杭州省方請示。我乃立即電報朱主席，朱也立即致電師官區。朱主席的電報到後，師管區也立即對我下了一道命令，說是派軍士教導隊，交阮司令率領，前往蘭谿，相機鎮壓。軍士教導隊的魯隊長即來見我，要我率其同去，否則要我給他以便宣行事之權。我說：彈壓傷兵並不是剿匪，有什麼便宜行事可言？何況傷兵有功於國家，少數人故意鬧事，地方政府自會解決。你只要去從旁恢復秩序即可，無論軍民，不得濫殺一人。現在你的上級派你來，你應該聽我的指揮，即行出發。他又提出要浙贛路局備專用車輛，要蘭谿縣政府備營地，辦供應，延到第二天午刻，他才動身。幸而陳縣長已經解圍，否則等魯的隊伍開到，蘭谿早已不堪設想了。事後我致電南京的軍政部請示，師管區司令可否對區保安司令發佈命令，奉何部長教之（應欵）電復，謂並無直屬關係，只可以用公函。杭州東南日報，以之作爲新聞刊布。

在金華的傷兵，聽說蘭谿的事件之後，就也有人要想製造麻煩。每次有傷兵到達金華，我皆派區司令部的副官葉潤璋到車站照料。傷兵要求甚多，葉力所不逮，常被打得面青手破，屢次不肯再去。經我力勸，才勉強繼續。十一月初旬的一天上午十時，有空襲警報，而××醫院的傷兵十餘人，在中正門城外的馬路上，騎自行車盤旋。在城門口負交通管制責任的區司令部特務隊，上前勸阻，不聽。轉瞬之間，敵機已飛臨上空，葉副官聞訊，也趕到城門口勸他們疏散，仍不聽。且立即跑回醫院，糾合八十餘人，快步跑至城

門口，將步哨毆傷，頭部流血不止。同來的醫院×副官，將特務隊的長鎗一支繳去，復囑聚到專員公署大門口，向內鳴鎗三響。其時警報雖尚未解除，我不得不立即到辦公室，先行下令如彼等再來，切不可鳴鎗抵抗。並將特務隊的士兵與鎗枝，撤至辦公室的後面房間。另由署部的工友，挑水夫，與公園的花匠，手持木棍，輪流守衛。果然不久，傷兵多人衝入大門，要搶鎗枝，同人均勸我暫避。我說：他們決不敢開鎗殺我，我一走，則人心大亂，秩序就更不能恢復。我就立在辦公室前面，看他們怎樣。他們竟穿過大禮堂，進入了後天井，與我相距不過數十步。特務隊士兵陳天仇站在我的旁邊，大叫：「我們的司令在此，你們要怎麼樣？」我看他們皆係徒手，諒無殺機。陳天仇即手持木亮鎗，朝天放了兩聲空鎗。他們不知虛實，乃即轉身退去。其時警報業已解除，醫院的人員也來了，反而說傷兵中有被區司令部特務隊打傷者，因而羣情憤激，他們無法負責。並且提出懲兇，登報道歉，賠償醫藥費一百元等條件。區副司令賀鉞芳與院方平時頗有來往，責以在空襲警報中縱容傷兵聚集多人，繳了特務隊的鎗械，又向專員公署鳴鎗，並衝入辦公室，要負全部責任。直談到下午二時，才答應將鎗送回，由專署贈洋十元，作為慰勞。其餘的條件，均由院方自動撤回。我為地方計，乃命賀將款送去，將鎗取回。而院方竟以我送去的十元，全數買了鞭砲，沿街鳴放，以示勝利。後來，賀副司令對我說，院方以漢奸罪名，在醫院門口鎗決傷兵一名，並另釘鍊收禁二十二名。

此後，中央軍政部成立了傷兵管理處，由魏益三任處長。關於傷兵的管理，乃漸上軌道。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我在武昌的平閩路陳辭修先生的家中，遇見魏氏，談起了上年傷兵在蘭谿金華滋事的情形。他認為幸而我當時因應得宜，否則可能造成大亂。

(陸)

我在金華的時期，也常奉召到杭州去。六月二十一日，我與第六區專員徐士達（箴）及第七區專員曹伯聞，同在浙江省政府大禮堂補行宣誓，由朱主席自己監誓，朱並即席報告浙江省財政狀況。徐、遼寧人，曹，湖南人。我與他們兩位，皆是在宣誓時，才第一次見面。當天下午，我們三人，同遊了一次西湖，縱談甚歡。第四區專署設在寧波，第七區則設在臨海，皆係浙江省沿海的地區。

我最後一次奉召到杭州，是十月九日。我向甫遷到金華的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兄，借用他的小轎車，由金華沿公路直駛杭州，沿途經過蘭谿、建德、桐廬、富陽各縣。這是我第一次循這條公路行車，沿途增加了不少見聞。我一早自金華出發，於下午四時，到達杭州的江干。適有空襲警報，車輛不能入城，遂折由虎跑而到了西湖的汪莊。五時許，警報解除，始得驅車進入杭州市，到了英士街五十四號我的家中。這是先父於民國十四年自建的住宅，其時我妻兒已住在金華，母親則於七月初，因先三叔仲眉公病危，與三嬪等自杭州返江蘇省的興化縣誰園探疾，臨行命家

中的老女傭朱媽管家。當時我也曾向省府請假回興化一行，未得奉准。仲眉公旋於農曆七月初七日逝世，享年五十八歲，我又向省府請假奔喪，仍以適抗戰發生不准。是年為先君逝世的第九年，先祖母逝世的第二年。此時我到了家門口，敲門良久，無人答應。而大門深鎖，亦無法進入。只得先到斜對門的滄州旅館，闢室居住。我猜想朱媽已過了六十歲，可能因怕警報，不敢住在城內，而避到郊外石蓮亭先父的墳莊上去了。乃於第二天一早，派人去找，果然將她找到。她有大門的鑰匙，我乃與她進入家中。見家中陳設，一切照舊。我問她如果膽小，我可以給錢讓她回到紹興的她的老家去。她一再的說：她已經在我家幫傭多年，又受了我母親與我內子兩代的付托，決定為我看家，不再走避。她當天就搬了回來，住在樓下的樓梯下面。她以為萬一轟炸，較為安全。我則仍住在滄州飯店，與各方面接洽公務，較為方便。

我到杭州的次日，朱主席在他所住的裡西湖孤雲草舍，召開會議。這是一幢磚造的紅色五層洋式樓房，因房屋較高，在湖濱就可以看到。所以題名曰孤雲，乃因隔水與孤山相對，而山上有「孤山一片雲」五字的石刻。至曰草舍，係屬謙辭。屋主劉梯青，吳與人，與朱主席為小同鄉，所以借給朱為官邸。

八一三淞滬之戰，我軍奮勇抵抗，日寇始終不得逞。到了十月初，敵軍有再行增兵擴大戰事之說。朱主席為未雨綢繆，所以約集軍政雙方，先作準備。這一天，軍方到的高級將領甚多，我

皆係初次見面。會議一直在空襲警報中進行，有過幾次緊急警報，出席的人員臨時疏散，而朱氏則未離開過他的座位。敵機也曾來上空盤旋，却並未投彈。軍方將領皆認為自蘇州到嘉興的國防工事，已在抗戰前建成，甚為堅固，可與法國的馬奇諾防線比美。即使我軍自淞滬後撤，浙西也尚可堅守一段時期。會議到了下午六時許才散，我們乃步行到杏花村吃晚飯，飯後又去參拜了岳武穆王廟與岳墓。

就在散會之後，晚飯之前，朱主席對我說：「戰事勢必擴大，杭州未必能久守，省政府不得不在浙東，預有佈置。今日本思在會議中提出商討，又恐軍方責我動搖人心。我想，省府如果後遷，只有金華、衢州與麗水三個地方，最為相宜，兄意如何？」我說：「衢州與麗水，均太偏，不若金華之位於浙江之中。」朱說：「容向南京請示後，再告。」

我這一次在杭州，馬路上的路燈，均已用黑紗包裹，可以減小光度，以利防空。晚間在路上經過，頗覺淒涼。杭州市市長周企虞（象賢）兄曾來看我，想借用我家隔壁的空地，建一公用防空壕洞。因其地正當英士街吳山路口，為新市場的中心地帶。杭州市內本少空地，在新市場尤為缺乏。我以此空地於先君在日，本思建市房出租，因未籌得建築費用，迄未能興工。先君逝世，瞬將十年，我初在國外，繼在南京，也無餘力建築。地既空着未用，借給市政府自無不可。誰知防空壕洞建成之後，小偷偷在洞中向內再掘，造成通至我家中的地道，輪番於夜間入內，將我家

中器皿、衣服、箱件，陸續偷走。我家中既只留朱媽一人看守，她年老膽小，夜間更不敢聞聲張望，遂致多日未曾發現。直至杭州危急之時，某日清晨，我忽在金華接到杭州蒙古橋警察第二分局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是有巡邏警士於是晨在我家牆外，見有人從防空洞中負箱而出，詢悉係我家物件，才知道已有多人在洞中來往多日，偷走甚多。現在人賊均已移送至杭縣地方法院，希我到杭州，前往法院領回物件。我問箱中是些什麼東西？警局說是破舊棉衣。我說現在杭州文武機關，包括法院在內，均已在撤退中。法院對已判刑或未判刑人犯，重者後移，輕者釋放。我現在忙碌異常，焉能到杭州與小偷打官司，領贓物。希即通知法院將其釋放，破舊棉襖，我也不要了。

我於十月十一日，自杭州回金華，仍乘用翁校長的原車。本以為還有機會再到杭州，誰知十一月五日，日軍在杭州灣的北岸，屬於平湖縣的金絲娘橋至金山衛沿海一帶登陸，以擊我軍之背。於是淞滬戰場情況，頓然劣轉。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長江以南，運河以東的大三角州，包括南京、上海、杭州在內，全部陷敵。所謂蘇嘉線國防工事，完全沒有用上。

我在軍情緊急省府後移的情況之下，自無法再回杭州。內子又將臨盆，也不能回去。於是杭州家中的一應物件，包括先君歷年的日記，他與親友來往的信件，任教員時所寫的講義原稿，任律師時所承辦的案件卷宗，以及他所收藏的字、畫、書籍、照片、陳設等等；及我自幼至長在家

中所存的文件，與從南京運回來的中外書籍等等，既無人可以整理，也無人可以搬運。待到杭州危急，才派我金華家中的工友連生回杭，因為他是紹興人，曾於先君在日，在我家中拉過人力車數年，對我家中的房屋及屋內情形，較為熟悉。我聽說杭州的水陸交通工具，均為軍方所控制。只有浙江省保安處，還可以調動軍船。我就在我的名片上，寫了幾個字，命連生到杭州去見保安處處長宣鐵吾兄。連生就沿途有車坐車，無車步行，居然到了杭州，也居然見到了宣處長。宣就在戎馬倉皇中，在我的名片上，批了派竹排一列，供阮某搬家幾個字。連生持片再到江干，見到保安處的派駐人員，指定了一列竹排。再回到城內，於人人爭相逃難中，以重金雇到了夫子，到我家中，隨手搬出了一堂紅木傢俱及一些箱籠物件，抬上了竹排。他就露宿在竹排上，經過了一個月的飄流，才到了金華。他說：幸虧插有浙江省保安處的旗幟，沿江才未被其他軍事機關將竹排拉去。連生識字無多，他也不知道那些應該搬，那些不必搬。何況已在小偷長期偷竊之後，加以時間上，也不容許他再為整理或選擇。因之，他搶運出來的物件，後來經我檢視，有價值的甚少。但是天寒地凍，他已歷盡了辛苦，我自不能再予以責備。凡連生未及運出的，均在杭州淪陷之後全部損失了。待我再到杭州，已經是在八年之後，勝利來臨。杭州老家，只剩下了一座空屋。

十一月二十六日，朱主席打長途電話給我，說是吳興失守，杭州震動，已向南京請示，奉核

定省政府遷至金華，已派民政廳視察室主任黃甫新（人望）君來金華籌備，希予以協助。黃是金華人，地方情形熟悉。但金華地方人士，在經常空襲之餘，對於省政府的遷來，並不歡迎，一則目標太大，空襲轟炸將隨之增多；二是居民增加，物價會隨之上漲。

黃到了金華之後，首先來看我，我說：「專員公署一應俱全，可以讓給省政府辦公。」黃認為房屋過高，距離車站太近，易成為敵機轟炸的目標。堅持要以省立金華中學的附屬小學，作為省政府的辦公地點，以八婺女子中學為財政與教育兩廳之用，以成美女中為省政府主席的官邸。其餘的機關，他也各有佈置。他又命令專員公署擴大軍警稽查處，委區副司令為處長。稽查處本來是由我於抗戰開始時設立的，由金華縣商會每月負擔經費一百元。黃既要擴大，就面允由省方另撥開辦費三百元，每月經常費三百元，但要專員公署先行墊付。不久，省會警察局，省保安處的特務連，均遷駐金華，加上原有護路的憲兵連，及中央撥來拱衛省會的九十三師彭營（他們到浙時，杭州已開始疏散，所以就停留在金華，並未赴杭），金華縣的警察與保安警察隊，單位複雜。每一城門，均見有四種以上的武裝同志在擔任守衛，卻沒有統一的指揮。

無處住宿，我也盡可能留宿。如第三區專員沈士華兄在交代之後，到金華等候車輛，要去溫州，就在我家中住了一個多星期。除省府人員外，從浙西來的我的親戚，老師，同學，同事，也是扶老携幼，早晚不絕。其中有打聽消息的，有借用川旅費的，有托買後方的車票的，有托代定旅館或設法臨時住處的，有在途中受傷要覓取醫藥的，我總盡一切可能，以期有求必應。

就在這紛擾未安的局面中，浙江省政府忽然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朱主席事先毫不知情，還是杭縣縣長葉嘯谷（風虎）在收音機中聽到廣播，打電話給他，他才知道。他本來準備非到最後，不離開杭州。他從杭州打長途電話給我說是在杭州與後任主席黃季寬（紹竑）辦交代，決定不到金華來了。我說：「朱先生既離開浙江，我亦當辭職。」朱說：「兄乃國家的人，值此戰事緊迫之時，不必與我同退。」

黃季寬曾在浙江省政府任主席三年，是朱先生的前任。但是我並不認識他。只聽到朋友說起過，他是可與做朋友的人，切不可做他的下屬。因為他自命為雄才大略，而且少年得志。與人談話，向來兩眼看天花板，不屑對人平視，所以浙江人向稱之為防空監視哨。在省府改組的命令中，同時發表賀培心（揚靈）兄任省政府的秘書長，王逸龍（克強）兄任民政廳廳長。這使我想到目前一年多天，黃由浙江調任湖北的時候，賀王二人就曾有此傳說。時隔一年，果然實現。所不同者，乃是浙江省政府而非湖北省政府。

作戰的高級將領，不以在軍情緊急時更動地方行政首長為然。但他們是軍人，不能對中央所決定的人事，表示意見。而黃季寬已於十二月三日，從南昌開了一列專車，來浙履新，車上帶了他在九江途中沿路收容從南京撤退下來的廣西士兵二千人及沿途編組的軍官隊三百人。他於午間在衢州下車午餐，而後將列車向金華駛來。我於當日上午接到 委員長致他的兩封密電，要我留轉。我以軍情正在緊急之時，乃用長途電話，將密碼報給衢州的專員魯長葆（忠修）兄，要他紀錄下來，面交黃氏，這樣，可以使他早半天看到。兩電，一長七百餘字，一長一百餘字，我在電話中報了一個多小時，方才報完。

下午九時半，他的專車到了金華車站，我在站等候。許紹棣兄時任教育廳廳長，已經遷到金華，他說：「兄與黃未見過面，我當為任介紹之事。」黃下車後，前呼後擁，進入了站長室。許為我介紹之後，我首先問 委員長的密電，已由魯專員面報。他說：「收到了，但密電本留在漢口，尚未帶來。」我乃將原電兩件當面送給他，他就順手交給身旁的副官，塞入衣袋中。我當時心中為之一冷，才知道迭任要職的人，不像我們教書先生，將任何事都看得那麼重要。

黃問許及我：「朱主席是否還在杭州？」我們答：「是，」我並且加了一句：「他在杭州等候交代。」我想他以為宋是文人，一定早已走了，不會仍在危城之中。他沉吟了一會，說：「好吧！那我就到杭州去吧！」於是下令將火車頭加煤加水，專車連夜開向杭州。許也另乘汽車回杭

，參加交接儀式。

朱黃二氏，係於十二月六日，在杭州辦理交接。新任省政府秘書長賀培心（揚靈）尚在湖北宜昌任行政督察專員，未能趕到。但賀有電報致黃，表示力辭秘書長，要保留省政府委員的名義，仍回到紹興去任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外傳是賀在上次離開紹興時，有許多交代案未了，必須回任清理。黃乃將朱主席所派的第三區專員沈士華，准其辭職，而命賀回紹興。又另以李立民任省政府秘書長。因省府委員名額已滿，李不能以府委兼秘書長，乃為純粹的事務官。李，安徽人，曾參加陳銘樞等在福建所設的人民政府。事敗，改了名字，由戴孝悃（戟）介紹給黃。黃上次在浙江任主席時，一度自兼民政廳廳長，命李任秘書，後升任主任秘書。李頗有官僚氣味，又有紹興師爺作風。他在接事時，對原任的省政府秘書長伍儼（儼）兄，百般挑剔，種種為難。伍是與我一樣，向來任大學教授，不知道官場的一套。朱先生在交代後，又從杭州打長途電話給我說：「本想經過金華到後方去，聽說黃接事後就要到金華，我只得走麗水經福建而江西而湖南而到漢口暫住，聽候中央的後命。我本來勸兄不必與我同退，現在看黃的態度，對我所用的人，具有成見，兄恐不能久留。如兄無法繼續工作，也可到漢口來，我們當在武漢見面。」

黃在接事之後，就回到金華。他說金華不宜作省政府的所在地，應該遷移到永康縣的方巖。於是省政府的各機關乃在天寒地凍之時，再行內遷。我就為他們徵調舟車，從金華江到武義江，

連木排全被徵用，我每天幾次到清波門的江邊去送行，只見帆檣林立，皆高懸着各機關的銜名旗，大小不等，蓋有官印，軍警分批看守。各機關的檔案傢俱器皿，公務員與其家屬及行李，飄流在木排上，前後相接，均向武義江流去。又時值連朝雨雪，真是泥濘不堪。

金華江上，原有兩座大橋。一是通濟橋，係石板所製，勉可通行汽車。一是浮橋，在石大門外，為通武義永康的公路車輛所必經。可能是雨下得太久，江水上漲；也可能是經過的車輛太多，不勝負荷。這一天下午，忽然斷了。這一下，可不得了。前方吃緊，大軍隨時要過境，後方疎散，車輛隨時要過江。我責任所在，立即動員民夫，懸以重賞，限時修復。我自己也赤了腳，穿了草鞋，頭戴草帽，身穿蓑衣，站在橋頭督工。因為風雨太大，尋常用的雨傘雨衣與皮鞋等，抵擋不住，反而是鄉間農民所用的，方能有效。到了晚飯後，雨勢稍止，乃點燃了火把，直到九時左右，浮橋才告修復。一輛橋車正駛到橋頭等待過江，乃係許紹棣兄趕到永康去有事。他看見我這一身裝束，於午夜猶立在寒風細雨之中，乃下車握手，表示慰勞。

黃季寬從杭州回到了金華，雖則命省政府遷到方巖，而他自己却決定住在距金華城十里的羅店，又命所有軍事機關，均留駐在金華，但可設於郊外。他要他的參謀裘士傑來對我說：撤銷軍警稽查處，派我兼任金華城防司令。我問彭營如何？他說要調走。我問另外是否有部隊供我指揮，他說沒有。城內治安，由區司令部の特務隊負

責。我說，那本來是我的責任，又何必另設立城防司令部？軍警稽查處乃於十二月底結束，每晚由我率隊巡城。十二月二十六日城區大轟炸之後，金華已等於是一座空城，但我仍冒着寒風大雪，在有如鬼域的無電無光的廢墟中打轉，真是不勝寂寞蒼涼之感。回到家中，手足皆僵。

次年，我在武漢，將我在金華時的情形告知先岳父錢逸塵（倬）公，他為補寫三詩為記：

一官誰分復從戎，慘耗飛傳警報中。墨經師貞哀長子，椒房臘祭阻神宮。況逢十載楹書痛，更有重關苦塊凶。國難未紓家已毀，怒潮長嘯浙江東。

鴻濤漂蕩岳家居，又值中原板蕩餘。母難難堪三播越，汝生生聚十年初。冲兒就傳知憐弟，法學傳家望啓予。長至陽迴應阜物，娛親好寫字兒書。

十萬大軍剛苦戰，危城巡徼屬書生。人家逃散成墟里，貓尤飢疲息吠聲。風雲寒年新易歲，拆鈴鈴夜一凭城。健兒五十勞前夕，報國同深守土情。

賀培心（揚靈）兄從湖北宜昌到了金華，他知道我與黃以往並無一面之緣，他說：「黃為人好大喜功，此次在山西娘子關打了一仗，很相信遊擊戰。兄只要說在轄區內可以發動多少民鎗，日後能如何打遊擊，他必定會留你，並且會重用你。」培心兄自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作違心之論。果然有一天，黃約見我，問我在第四區中有多少民鎗，我照實說了，但是我聲明這種統計數字，未必可靠。各縣有以少報多的，也有以多報

少的。況且種類不齊，子彈不足。平時保鄉防匪則可，要與敵人作戰，就難有把握，他聽了就表示不高興。他說，他已經準備發表一百零幾位遊擊司令，皆係在各縣持有民鎗者，並且準備於次年元月三日，在方巖召集他們，開擴大遊擊會議，商量日後如何打遊擊。我說：浙東地方不大，突然間，新產生了一百多位遊擊司令，民間必受騷擾。黃不理會我，却接着說：第四區各縣，現有多少積穀，先撥出二十萬石，給這些遊擊隊伍，作為給養。我說：四區一共沒有二十萬石的存糧，積穀的數字尤少，還要預備作明年春耕或有春荒時，救濟民食之用。他聽了我的話，便起身送客。

我看了他的情形，自己知道無法再幹下去，雖則時值民國二十七年的新年，但大軍初退，杭州陷敵，政府與人民，皆沒有心情過年。加上連朝風雨，大雪紛飛，地凍天寒，流亡載道，更看不到任何的新年景象。元月三日，黃在方巖召集所謂擴大遊擊會議，並未通知我參加。四日下午，我到羅店去看他，當面辭職。黃似早已料到我就要走，就立即說：「我就派趙龍文來接，他從杭州帶來了不少人，需要地方安置。」我也就表示了幾句感謝的話，告辭出來。

我回到專員公署，就正式致電已遷到方巖的省政府，請求辭職。五日，奉電照准。電文中有些幾句嘉勉的話，後來我才知道是省政府秘書夏鳳歧（狎）擬的稿，黃季寬與李立民均未親自判行。夏、浙江省嘉善縣人，在省政府任職甚久。八日下午四時，趙龍文兄到專署見訪。他是

浙江省義烏縣人，原任杭州省會警察局局長。我說：「省府已准我辭職，派兄繼任。兄何時可以來接？」他說：「我現在就是來接事的，但不知兄準備好了沒有？」我說：「那好極了。我平日就準備隨時可走，一應公文帳冊，皆極為清楚。」他乃走到天井中向外招手，就走進了幾個人，他向我介紹，是他帶來幫他來接事的。我也立即到辦公廳，召集署部高級人員，介紹給他認識。

我說：「專署的經費，因為我平時很節用，所以結存了不少。本想趁杭州撤退的機會，在退到金華的商人所有的車輛中，為專署買一部汽車，以利於行。但因會計審計手續繁多，尚未購成。惟前幾天，已商得新任建設廳廳長伍展空（廷鸞）的同意，向省公路局買到了五十箱汽油，存放在專署的防空洞中，尚未動用。現將全數餘款及汽油一併移交。」趙聽說之後，大為高興，因為現款與汽油，在戰時戰地，都是很容易獲得的。我們就在幾分鐘之內，交接完成。其時省政府的正式任免令文，尚未到達。既無監交人，也無儀式。我交代之後，一個人從專署花園的後門走向柴場巷的家中。真是無官一身輕。而大正初生，也是有子萬事足。回想這八個月的官場生活，真是五味俱全，多此一舉。

在五日至八日之間，有一天晚上，我到金華縣政府，應新任縣長王力航之約便飯。王、湖南人，也是黃季寬到任之後新委的，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職。原任縣長章之鴻（駒），湯溪人，是中央政校的畢業生，調任慈谿縣縣長。章縣長是在胡次威兄任專員時，就到金華的。我

既是他的老師，又是長官，所以任何事，我都代他做，我從不向縣政府推，因而我更忙了。我這晚在王縣長處遇到宣鐵吾兄，他奇怪我為什麼辭職照准了，不早一點離開這危城，而派秘書代辦交代。我說，我要自己辦。我並且說，我可以交出一大筆的節餘經費與汽油，他認為這是官場中前所未有的事。

我交代之後，自當照朱先生所說的，到漢口去。朱先生當時也還沒有工作，我去也不知有什麼機會。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有把握的，就是元月十六日，由浙江省黨部轉來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果夫先生從長沙致我的電報，要我仍回校任教，並以寒假將畢，囑我迅速啓程。政校自抗戰開始，先自南京遷至江西省的廬山，一年級未招新生。南京陷敵，再由九江經南昌遷至湖南省的省會長沙市。其時又由長沙，後遷至芷江縣。我去武漢，在行程上，一定要先經過長沙。

內子本不贊成我從政，聞我辭官獲准，極為欣慰。但她甫生產十天，自不宜帶了兩個孩子在交通極為困難之時，伴我作長途之行。我既離浙，長住在武義也不是辦法。她們乃從武義，循着公路，經永康、縉雲、麗水、青田各縣，車行一百四十四英里，暫住到溫州。以便我一個人可以行動方便，到長沙與武漢，看看情況，再定行止。她們到了溫州之後，住在五馬街一家旅館中。適沈士華兄在我金華家中住了幾天，也已到了溫州，借住在張叙虛先生家中。就在她們到達溫州的當晚，士華兄與張先生談到我的家人。張先生說：「民國七年，我與毅成兄的令尊荀伯先生一

同任浙江省第二屆省議會議員。荀伯先生競選議長，我曾投他一票。但因另有人用金錢賄選，而他堅持不請客，不買票，以致落選，我對他一直很爲敬重。我與毅成兄雖則從未見過面，但既是故人之子，而毅成兄又在爲桑梓勤勞。現在他的杭州老家陷敵，真是國破家亡，妻離子散。我必須接她們到我家中居住，一切由我照料。」叙虛先生並立即與沈士華兄到了旅館，將內子一行接回家去。她們付了一晚房金，並未過夜。其時二兒大正出生十日，在長途勞頓之餘，忽病小腸氣，當晚由叙虛先生延請王醫生爲之診治，不久告愈。

我在交代之後，自當先到已遷至方巖的省政府辭行。從金華到永康，從永康到方巖，雖則有了公路，但車輛至爲缺乏。直到十二日的晚間，才得搭乘胡健中兄的便車，先到武義，再到永康，住在城內的悅來旅社。因爲旅客擁擠，我只能得到危樓上的一間木造小屋，除一榻一椅外，不能再容他物。榻鋪稻草，椅係竹製。我在永康住了五天，曾到方巖去了一次。省政府秘書處設在五峯書院的山洞中，以防空襲。我第一次瞻仰了鷄鳴、覆釜、桃花、瀑布、固厚五峯。峯峯皆拔地而起，有類桂林的諸山。峯尖與峯尖之間，有陽光透入，稱爲羊角尖。五峯書院在南宋時，曾爲朱子講學之地。其旁邊的山頂上，有胡公大帝廟，香火甚盛。胡公名則，字子正，係永康人。曾任宋代的兵部侍郎，因奏免衢婺二州的錢糧，爲人民所愛戴。廟下有巖下街，開設有大小旅館十數家，供應香客居住，此時即作爲各廳處的辦公

之所。這是我第一次到永康，也是第一次到方巖。

我再從永康，搭乘李楚狂兄的便車，回到金華，而柴場巷的房屋，已由胡健中兄遷入居住。先是健中兄聞我將赴武漢，乃托我向房東項校長接洽，由其繼續租住，項校長也答應了。因爲丙子自己所監造的防空洞，還是可以算得上堅固，所以健中兄要搬進去。我回到金華，只得臨時住到酒坊巷金華縣黨部。楚狂兄所主持的浙江省抗敵後援會及其服務團，從杭州退出，也設在縣黨部內。天寒風雨，一場蕭然。

十八日晚，胡健中兄在柴場巷我家舊居中，設便飯爲我餞行。主賓二人，對談對飲。他並即席填了一闕浣溪沙，以壯我行色：

風雲燈窗話別離，淒涼巷陌馬頻嘶，危城今夕幾人支。

此去總多憂國淚，重逢應在渡江時。爲君更賦阮郎歸。

健中兄的詞句，後爲鄭烈孫（文禮）兄所見，乃亦填一闕見贈：

鼙鼓聲中話別離，簪纓初解着征衣。載途風雪赴昆池。

詞客哀時餘涕淚，書生報國共襟期。湖樓痛飲幾時歸？

時金平歐兄任職武義縣縣長，聞我辭職，特到金華相送，並賦詩以留紀念：

存亡危急掌機樞，八月何嘗夢息軀。艱苦撐持半壁後，敵人猶未犯全區。

移交親辦即長征，客滿樽前笑語傾。此去中樞加重任，漫云事足一身輕。

民國六十年，我在臺北遇到平歐兄，告以其三十多年前手寫的贈別詩，我尚保存，並隨即影印了一份寄給他。後來在第二次全國書展中又遇到他，問他曾收到否？他說收到了，慚未作復。不久，他填了一闕御街行寄給我，用的是范仲淹的原韻。再不久，他就逝世了。他的原句是：

彎彎曲道書香砌，顧客衆人聲碎。紛陳廣廈，只樓虛滿目書城拖地。匆匆瀏覽，五光十色，觀看行多里。

阮公一遇如心醉，話往事，幾流淚。回思故國相送歡，猶記當年滋味。說來此事，心中慚愧，疏懶未曾避。

當時浙贛鐵路之火車，因爲軍運繁忙，客車沒有一定的行車時刻。旅客要坐在車站上等候，何時能走，無法預知。我一再托人到車站去探聽，直至一月二十日上午，才聽說就有車可以附乘，乃急忙步行趕到車站，李楚狂兄派服務團的一輛手車，爲我裝運行李。進了月台，於十一時半登上了來車，車上已擠滿了傷兵難民，我勉強得到了三等車的一張最高舖。三等臥車係有相對的兩排舖位，每排三層。較之露天坐在車頂上的乘客，已經幸運很多。車於十一時半開行，沒有一個來爲我送行的人。較之八個月以前我初到金華任職之時，車站上擠滿了歡迎的人羣，別是一番情況。火車慢慢的離開了金華車站，慢慢的駛過了金華江大橋。我獨自在車中對車窗外的金華城，金華江，金華的友人們，默默地說：

「別矣金華！」

六十一年三月一日，在臺北寫畢。